

吕红波 王庆英 辛怡萱 著

党员应知应会

100词



人民日报出版社

吕红波 王庆英 辛怡萱 著

党员应知应会 100词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党员应知应会 100 词 / 吕红波, 王庆英, 辛怡萱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2.5

ISBN 978-7-5115-7262-2

I. ①党… II. ①吕… ②王… ③辛…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
员—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 D26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013931 号

书 名: 党员应知应会 100 词

DANGYUAN YINGZHI YINGHUI 100 CI

作 者: 吕红波 王庆英 辛怡萱

出 版 人: 刘华新

责任编辑: 谢广灼

装帧设计: 小板设计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1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字 数: 286 千字

印 张: 12.5

版次印次: 2022 年 5 月第 1 版 202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7262-2

定 价: 49.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001- 民主革命 / 002
- 002- 共产国际 / 005
- 003- 中央局 / 008
- 004- 中央执行委员会 / 012
- 005- 无产阶级专政 / 016
- 006- 阶级斗争 / 020
- 007- 最高纲领、最低纲领 / 024
- 008- 大革命 / 028
- 009- 工农联盟 / 031
- 010- 民族资产阶级 / 034
- 011- 小资产阶级 / 037
- 012- 统一战线 / 040



- 013- 国民党左派和右派 / 044
- 014- 白色恐怖 / 047
- 015- 武装起义 / 051
- 016- 前敌委员会 / 054
- 017- “左”倾、右倾 / 057
- 018- 教条主义 / 061
- 019- 左 翼 / 064
- 020- 土地革命 / 067
- 021- 红色政权 / 071
- 022- 苏维埃 / 074
- 023- 反“围剿” / 077
- 024- 敌后战场 / 080
- 025- 持久战 / 083
- 026- 顽固派 / 086
- 027- 大生产运动 / 089
- 02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093
- 029- 布尔什维克 / 097
- 030- 新民主主义 / 101
- 031- 整风运动和整党运动 / 105

- 032- 反“扫荡” / 109
- 033- 民主联合政府 / 112
- 034- 政治路线 / 115
- 035- 共同纲领 / 118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036- 独立自主 / 122
- 037- 土地改革 / 126
- 038- 镇压反革命 / 130
- 039- “三反”“五反”运动 / 133
- 040- 五年计划 / 136
- 041- 过渡时期总路线 / 140
- 042- 社会主义改造 / 144
- 04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147
- 04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150
- 045- 政治协商 / 154
- 046-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158

- 047- 知识分子 / 161
- 048- 十大关系 / 164
- 049- “双百”方针 / 168
- 050- 民主集中制 / 172
- 051- 社会主要矛盾 / 176
- 052- 人民内部矛盾 / 179
- 053- “反右倾”运动 / 183
- 054- 中苏论战 / 187
- 055- 四个现代化 / 191

第三部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 056-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196
- 057- 拨乱反正 / 200
- 058- 平反冤假错案 / 203
- 059-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206
- 060- 小康社会 / 210
- 061- 党内政治生活 / 214

- 062- 思想路线 / 218
- 063- 时代主题 / 221
- 064- 基本路线 / 224
- 065- 政治体制改革 / 227
- 066- 治理整顿 / 230
- 067- 资产阶级自由化 / 234
- 068- 历史虚无主义 / 237
- 06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240
- 070- 所有制 / 244
- 071- 战略思维 / 247
- 072- 和谐社会 / 250
- 073- 社会主义新农村 / 253
- 07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256
- 075- 文化软实力 / 259

第四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 076- 中国梦 / 264

- 077- 伟大斗争 / 267
- 078- 斗争精神 / 271
- 079- 担当精神 / 274
- 080- 战略定力 / 278
- 081- 顶层设计 / 281
- 082- 颠覆性错误 / 284
- 083-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 288
- 084- 新常态 / 292
- 085- 新发展理念 / 295
- 086- 新发展阶段 / 299
- 087- 新发展格局 / 303
- 088-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307
- 089- 全面开放新格局 / 311
- 090- 大统战工作格局 / 314
- 09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318
- 092- 意识形态 / 322
- 093- 红色基因 / 326
- 094- 革命精神 / 330

095-	国际话语权 / 333
096-	中国方案 / 337
097-	新型大国关系 / 341
098-	全球伙伴关系 / 345
099-	全球治理体系 / 348
100-	新型政党制度 / 352
101-	党的全面领导 / 355
102-	政治意识 / 358
103-	自我革命 / 361
104-	党的政治建设 / 365
105-	党内政治生态 / 368
106-	关键少数 / 371
107-	主体责任 / 375
108-	总体国家安全观 / 378
109-	国之大者 / 382
110-	全过程人民民主 / 385

后 记 / 389

第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001

民主革命

就世界范围而言，民主革命是指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如 1789 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即属此例。但就我国而言，由于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也必须反对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的帝国主义势力。即是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担负着完成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使命，必须同时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就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为此，中国社会各阶级纷纷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开启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然而，无论是地主阶级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还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旧式农民起义，抑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变法，都未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更无从谈起。

直到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举起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才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但是，

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纲领，没有比较广泛地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其他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因此，“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①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中国革命需要寻找新的方向，走上新的道路。恰在此时，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这场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觉醒。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分析、比较和鉴别下，最终被选择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由此，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就从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指导理论就从三民主义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开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从性质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同于鸦片战争以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和历史上欧洲、美国发生的民主革命不尽相同。它并非要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实现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页。

专政，从而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当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相同，它寻求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但却不破坏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形成了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①的正确路线。经过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最终于 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开辟了光明前景。从此，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但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而且成为 20 世纪继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伟大事件。它鼓舞和推动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发展壮大了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力量。

^①《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87 页。

002

共产国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1889年在法国巴黎建立的工人运动的世界组织）破产。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一定程度上鼓舞、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是无产阶级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1919年3月2日至6日，来自21个国家、35个组织的52名代表聚首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重要文件。这次大会宣告第三国际正式成立，并将其命名为“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总部位于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凡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均属于它的支部。共产国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确立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共产国际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国际主义旗帜，主张把民族范畴内的阶级斗争同世界革命结合起来，并积极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建立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20年春，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维经斯基等人前往中国，了解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以及是否有条件建立共产党组织。维经斯基来华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多次会谈，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给予了指导和帮助。1922年7月，党的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而中国共产党也从共产国际获得了宝贵的援助和指导。

1924年至1927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下，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革命。对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携手合作，共产国际起到了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但在大革命的过程中，面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和活动，共产国际也缺少清醒的认识和必要的斗争，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因此，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形成和大革命的失败，固然与中国共产党建党时间不长、斗争经验不足有关，但客观分析，共产国际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中国革命的形势转入低潮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六大。这次大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和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也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以致中国共产党接连犯下了一系列“左”的错误。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些成果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因电台丢失而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其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在组织上也进一步独立。在双方恢复联系后，共产国际大大减少了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涉。

鉴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斗争情况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从本国实际出发处理面临的问题，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这一提议，得到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同意。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停止活动。在其存在的24年时间里，共产国际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新的高潮，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掀开了新的一页。从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到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期间，都曾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003

中央局

党的一大召开时，由于党组织和党员的数量都很少，因此虽然大会作出了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规定，但决定暂时不组织正式的中央。而为了和当时存在的个别支部进行联系，党建立了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其后，在党的二大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以建立，取代了之前的中央局。

1923 年党的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这是党内第一部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专门法规。其中规定：“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其职务如下：委员长主席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遇委员长缺席时，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员长之职权。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68-269 页。

这里首次明文规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再选举成立常务机构——中央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随后，新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等五人组成中央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并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宣传部委员，并由以上五人组成中央局。

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并选正式中央执行委员若干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得改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Secretariat）处理党的日常事务。”^①这是首次在中央委员会内规定设立中央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将全党的领导决策工作和处理日常工作分开。与此同时，中央局取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30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等的指示》中决定：“在湘鄂赣这一广大苏维埃区域中成立中央局，其管辖区域以所有苏维埃区域为范”^②，并指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27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页。



关向应为书记，前往中央苏区组织苏区中央局。但关向应因故无法抵达，中央决定改派江钧（项英）前往。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给长江局转红一三两集团军前委的指示》中又说：“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①但由于前委没有收到这封指示信，因此在项英未到达中央苏区前，苏区中央局一直没有成立。

1931年1月15日，在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宣告成立。苏区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当时的南方局、长江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由它来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月两次召开会议，决定增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苏区中央局工作，指定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和苏区一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四人为常委，项英为代理书记，任弼时负责组织工作，王稼祥负责宣传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但到了5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规定苏区中央局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并对苏区中央局的管辖范围作了调整，指出：“江西苏区的中央局，他的管辖范围是包括江西省委、闽粤赣省委、湘东南省委、湘鄂赣省委、赣东北省委各苏区”^②。这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6页。

样，就明确了苏区中央局指导的只能是江西等五个省委的工作，而不是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

任弼时等人到达中央苏区后，在工作中感到毛泽东的见解和能力都超过项英，因此于10月11日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请求中央批准毛泽东代理中央局书记，获得中央同意。其后，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无法在上海立足，决定派周恩来去中央苏区工作，并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与苏区中央局成员会合，组成了新的中共中央局，领导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但仍常用苏区中央局名义行文。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并设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至此，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的中央局不复存在。其后，中共中央虽然还曾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过多个中央局，但这些中央局都只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只在各自管辖区域内负责领导军事斗争、经济、文化建设等。



004

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的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同一地方设有五个委员会时，应由全国代表会议委派十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如上述要求不能实现，应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细则另订。”^①这就明确规定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明确了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条件。

然而，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也只在几个地方建立有党的早期组织，并未达到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条件。为此，1921年11月，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①但在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声明》中，已经开始使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时，全国虽然只有195名党员，但此时的地方党组织已经有了发展，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条件已然具备。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得连选连任”。“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②在《章程》的纪律部分还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③这就明确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大会闭会期间党的最高机关，而且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任期、组成、权力等作了具体规定。经过大会选举，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达、邓中夏、向警予当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16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选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增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当选人数，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中央委员缺职时应以候补委员补缺。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一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①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9人为正式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删去了原先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得连选连任”的内容，并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②在党的文献中，这是首次将“总书记”规定为中央委员会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大会通过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决议案》，还就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进行了评价，指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叮嘱“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意组织的指导”“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

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①。

1927年6月，党的五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党的组织系统为：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市或县——市或县代表大会——市或县委员会；区——区代表大会——区委员会；生产单位——支部党员全体大会——支部干事会。^②从此，原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仍作为中央最高领导机关。在这次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但在其后一段时间，也还有使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称的文件，如1927年7月29日、8月7日和1928年6月18日，党中央分别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署名发表《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等文件。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对在指导南昌起义中犯有错误的张国焘施之以纪律处分时，仍有“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③一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页。

005

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又称工人阶级专政，是指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相结合的，以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国家政权。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连的。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强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①。在写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马克思还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②的口号，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语，并指出：“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③。1875年5月，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一经形成，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1871年，法国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这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公社的历史功绩却长存不灭。马克思曾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②

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在俄国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面对当时俄国国内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局面，列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使用革命暴力，使用铁的手腕，以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但是，列宁并没有把无产阶级专政仅仅归结为镇压，而是将破旧与立新结合起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③。

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③《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页。



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①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要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声明，中国共产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②。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于1949年6月写下《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人民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之一，“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③。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④这就明确了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其中的总纲第一条，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58页。

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当时我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出发，将我国的国体阐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①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立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的阶级状况，将总纲第一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一，二者都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都是绝大多数人享有民主权利而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第二，二者都承担着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扩大人民民主，镇压敌对势力反抗，保卫和巩固革命成果，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职能；第三，二者都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社会不平等，为未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而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表述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逻辑，也更全面地揭示了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此，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0-45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③ 《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8页。

006

阶级斗争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篇纲领性文献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开题，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②结尾，通篇贯穿着对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现实状态和未来趋势的分析。1936年，毛泽东在回忆自己如何从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③

“阶级斗争”，顾名思义，是指对抗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所谓“阶级”，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集团的劳动”^①。在阶级社会里，正是由于不同阶级之间存在根本利益的对立，由此引发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并使阶级斗争成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共产党宣言》对阶级斗争的理论阐发，标志着现代无产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自身的阶级地位，已经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了自为的阶级，一个通过建立自己的政党而承担起自身历史使命的阶级。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②作为党的纲领之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又明确“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③。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时，规定其主要工作是“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并“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还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④。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统一组织下，党出版各种刊物，开办夜校、识字班等文化组织，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理论，促进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形成和觉悟的提高。党还组织工人团体并领导工人罢工，形成了1922年至1923年的第

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④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运史料》1980年第1期，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5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部著作中开宗明义地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①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②，也就是没有正确地找到革命的对象和盟友。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及形成原因进行了科学分析，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要团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和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这就为中国革命如何寻找力量、如何取得同盟军指明了努力方向和科学路径。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将革命转入农村，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农民的阶级觉悟提高后，开始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灵活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提出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再次创造性地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

①《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页。

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的基本政治纲领，这便将一切进步的阶级和阶层团结为反对压迫的阶级斗争的主体，形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通过开展正确的阶级斗争，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被彻底消灭，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已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也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外就完全没有敌对分子，完全没有阶级斗争了。由于我国还处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势力还会对我国进行侵蚀和破坏。因此，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被激化。对此我们不能疏忽大意，必须继续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页。



007

最高纲领、最低纲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进行过长时期的斗争，这些斗争有重大的意义，但也有两个根本性的弱点：第一，没有认清革命的对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第二，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深入到下层的工农群众中去，未能形成有组织的、持久的群众运动。这是以往的革命斗争成效甚少的两个主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尽快制定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党深刻认识到，时局如此动荡，如果不先推倒祸国殃民的大小军阀及帝国主义，一切美好理想的实现都无从谈起。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第一次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大会宣言指出：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无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①；另一方面，中国“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①，“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②。

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党的二大提出，党的目的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③，这实际上就确立了党的最高纲领。同时，党的二大还指出，为了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④，这也就是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

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初步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即是说：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中国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中国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大会宣言还强调，为了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党成立不过一年，就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使这个纲领很快传播开来，成为广大群众共同呼声，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纲领、最高目标，又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出发，制定出党要实现的最低纲领、具体目标。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从这三个方面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坚持和展开，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行动纲领和准则。这个基本纲领，既对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分别做了概括，又对于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也分别做了论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了基本的框架和蓝图。

党的最高纲领为党的最低纲领的制定指明前进方向，党的最低纲领为党的最高纲领的实现准备必要条件，二者统一于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全部历史过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既要始终胸怀共产主义崇

高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地为党在一定时期内带有根本性的政治目标和行动方针而奋斗。正如毛泽东所言：“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①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008

大革命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党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影响力异常强大，单靠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无法推翻它们。为着革命的胜利，必须与其他革命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肯定了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实行国共合作，让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当然，大会也强调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时，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时，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由于共产党员的加入，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国共两党以广州为中心，团结汇集全国的一切革命力量，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因为这场革命声势浩大，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从中国革命的形势出发，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强调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全国范围的革命斗争更加风起云涌。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下，上海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和示威游行，抗议半月前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游行队伍行至南京路上，租界英国巡捕突然开枪，打死学生、工人等13人，伤者不计其数，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全中国人民极大愤怒，多年来深埋在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随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迅速席卷全国，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在五卅运动掀起的全国反帝运动中，省港大罢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领导作用，也使党进一步认识到了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快速传播，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随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从广东起兵北伐，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在以湖南为中心的中国广大农村，掀起了大革命的风暴；城市的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上



海工人更是举行了 3 次武装起义，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以沉重打击。

面对北洋军阀势力的迅速崩溃，帝国主义列强一方面集结兵力、制造事端，企图以武力相威胁，再次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另一方面又积极寻找在华代理人，对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进行拉拢。蒋介石在倒向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后，先是在 1926 年 3 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和工农力量，后来更是于 1927 年 4 月 12 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并以“清党”为名，在东南各省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于 1927 年 7 月 15 日召开“分共”会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并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的组织也得到很大发展。在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党深化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初步获得了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009

工农联盟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着当时全国的994名党员。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等11个议决案，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必须有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普遍参加，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指出没有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并使革命获得成功的。

中国工人阶级具备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一切特点，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毛泽东曾经对中国的工人阶级作过这样的评价：“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①。由其先进性决定，中国工人阶级必然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然而，中国工人阶级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①，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②。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产生了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农民群体，他们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近代以来，中国受到工业文明冲击，陷入民族生存危机，但农民作为中国社会主体劳动者的地位并未改变，依然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不仅先进的无产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而且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处于社会最底层，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盟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把农民阶级作为自己的同盟军，与之结成坚固的工农联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强有力的工农联盟，经过 28 年浴血奋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此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但党并没有忽视农民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下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述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主要的基本的经验，指出新中国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③，并特别强调这一专政的基础“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④。而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也决定了农民问题有着举足轻重

①《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44-645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45 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2 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8 页。

的地位。

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独特的革命道路，决定了广大农民不仅是革命的主力军，而且是我国国家政权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数最多的依靠力量。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完全符合我国现实的阶级状况，鲜明体现了我国国家政权的广泛基础和民主性质。

010

民族资产阶级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始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投资兴办近代企业。与洋务派开办的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不同，这些企业具有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这些企业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已经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并产生了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

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使得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壮大了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并掀起了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奖励和保护工商业，鼓励人民兴办实业，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并设立实业部，在各省成立实业公司，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摆脱了封建专制的阻碍，又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的良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繁荣。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极大提高。

成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深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有反帝反封

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又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经济政治力量弱小，既不敢也无力推动社会变革，具有与生俱来的妥协性，只能充当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①“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②。这一科学论断，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抗日战争时期，当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后，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策略。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③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科学决策，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对国民党政府抱过幻想，企图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三条道路，却遭到反动当局的严酷迫害。总结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出发点，制定和实施了政治上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一系列政策，巩固和扩大了党领导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这就争取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维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①，制定了保留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将其纳入爱国统一战线中，并强调要特别注意同民族资产阶级搞好经济上的合作，以巩固政治上的合作。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从1954年至1956年年底，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创造性的“和平赎买”政策，即通过公私合营等多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经过三年的努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在此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也从剥削者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从此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011

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一词的英文是“petty bourgeoisie”，在20世纪20年代翻译成中文时曾经被表述成“小绅士阀”“小绅士阶级”“小有产阶级”等。1925年12月，毛泽东在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将小资产阶级描述为“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①这样一个广泛的群体。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②。他认为，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大致处在同一经济地位，但却可以细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其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为接近，这种人胆子小，怕官也怕革命，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他们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大体可以自给的，其有发财的欲望却难以如愿，这种人受到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对于革命取中立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态度，不肯贸然参加，但是绝不反对革命，他们的人数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其生活每况愈下，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在革命运动中颇为要紧，他们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

对于革命的态度，小资产阶级内的这三个部分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在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却都有可能参加革命。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党在不同时期，总是依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对小资产阶级制定和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乡村。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党把阶级斗争看成是保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唯一有效的办法，主张无产阶级必须与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以应对共同的敌人，但同时要消除小资产阶级的某些思想、作风和习惯势力对革命的消极影响。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①。为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恶劣影响，古田会议决议要求加强政治教育，并在制度和政策上采取措施。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相继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领导和团结各阶级阶层一致抗日和革命的新任务。尤其是这一时期，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党而来，一方面使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与大量新鲜血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液，另一方面也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消极方面不同程度地带到了党内。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除了对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更在实际的工作和斗争中帮助他们克服缺点，特别是通过整风学习的方式让带有小资产阶级残余色彩的党内成员转变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基本沿用了之前将城市与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区分开来的思想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提法。对于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主要靠土地改革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来解决，对于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主要靠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解决。1956年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业、手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绝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小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阶级，小资产阶级也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②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642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012

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策略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依靠强有力的统一战线，我们党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夺取了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如今，统一战线仍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几个时期。从总体上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包含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当中主要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当中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这两个联盟里，第一个联盟是基础，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争取广大的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才能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同时，只有把第二个联盟发展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才有完全的保障。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所以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从根本上看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所决定的。对于当时

中国的阶级状况，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①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战胜国民党所代表的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就必须团结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同时，这也是由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些矛盾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近代中国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把一切反对外来压迫、不愿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受着它们的压迫，因而能够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当革命的目标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时候，在别的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也极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有必要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逐步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从抗日战争的过程来看，七七事变后，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党号召一切爱国力量和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促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中明确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利’”^①，“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②。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再次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③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将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推动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面向新时代全面谋划统一战线发展。这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遵循。

当前，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①

^① 参见《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载《人民日报》2021年1月6日。

013

国民党左派和右派

作为政治概念，左派和右派两种称呼最早起源于 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当时的各种立法议会中，激进的革命党人都坐在会场的左边，温和的保王党人都坐在会场的右边，由此便产生了左派和右派这两种用来描述不同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分类。通常来说，左派一般主张积极改革，把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革除，从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右派一般较为保守，主张缓慢、稳妥，强调维护旧有传统。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在大革命的浪潮中，革命武装的建立和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和军阀势力大为恐慌。在南方占有很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买办阶级更感到难以容忍，他们采取外部压迫和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对大革命进行破坏。这就诱使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出现了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划分的基本标准是：凡是对工运、农运，对共产党抱有同情和支持的，便是左派；反之，凡是反对孙中山确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便是右派。

当时，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对在国民党内如何工作缺乏经验，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些过于忍让迁就的倾

向。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为了总结经验，确定以后的工作方针，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正确处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要坚持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为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并努力加强左派，削弱右派。会议通过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指出：“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①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又分化为老右派和新右派。老右派以冯自由、胡汉民、林森、邹鲁、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为代表，在1925年年初组成“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新右派形成于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年初，以蒋介石、戴季陶等人为代表，以戴季陶主义为理论依据，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要求。1926年间，他们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挤共产党人，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1927年他们又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党人，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代表。

面对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和对革命群众的疯狂屠杀和镇压，1927年6月30日，国民党左派代表邓演达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1页。



同志们》的公开信，指出：“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做去，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国民革命”^①。这表达了他对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拥护。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也代表国民党左派同背叛孙中山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决裂，并义正词严地揭露了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背叛三大政策的可耻行径。

1928年年初，在上海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及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响应邓演达等于1927年11月1日发表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由谭平山等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会议推选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季方、朱蕴山、邓初民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在邓演达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由于中华革命党的主张既不同于国民党，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做法，因此被人们称为“第三党”。该党成立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突击》和《灯塔》两个周刊作为舆论阵地，用大量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的暴行，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该党中央先后委派党员到北平、四川、江西、山东等地开展活动，建立地方组织。

^①《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这样，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形成了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9月，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合并。1928年12月29日，主政东北的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遵守三民主义，改变旗帜。这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自己领导的军队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并借鉴苏联把与苏联红军对立的军队称为“白军”的做法，也将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与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为敌的军队称为白军，并将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地区称为白区。在反动政权统治下的白区，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的反抗斗争，大肆逮捕、拷打、屠杀革命人士，因此我们将这种血腥的氛围和形势称为“白色恐怖”。

为了消灭共产党，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制止共党阴谋案》，在国民党内进行“清党”，称“凡经审察确为属于共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者，均应积极铲除，或预为防范”。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30次会议通过《暂行反革命治罪法》，



规定对“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者”，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这些条文还被写进同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刑法》。国民党新军阀采取法西斯主义和亚洲式的野蛮专制之凶恶手段，穷凶极恶地镇压工农运动。他们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施以血腥而残忍的挖眼拔舌、割肠斩首、洋油焚烧、红铁火烙等酷刑，其野蛮和残忍程度骇人听闻。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各地革命的工会和农会等组织被查禁。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280余万人锐减至几万人。从1927年7月到1928年6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年间，党接连发动和领导了47次罢工斗争，有34万余工人参加，但取得胜利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归于失败。各地农会拥有的近1000万会员，也大多被解散。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河南、陕西、四川等省，虽然先后爆发多次农民武装起义，但多数也以失败而告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在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大量党外革命人士倒在了血泊中，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据党的六大进行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①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

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先后慷慨就义、英勇牺牲。

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也弥漫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思想不坚定的人动摇悲观，他们主动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或共青团。还有一些人甚至为了苟全性命，背叛革命，可耻地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了令人唾弃的叛徒。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5.8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①

在白色恐怖中，革命者血流成河，但坚定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光辉旗帜，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共产主义的信念。被捕前任湖北省省委常委的夏明翰在就义前的绝命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在牺牲前写给妻子的遗言是：“望善托吾儿，以继余志。”江西弋横起义第六路指挥邱金辉临难时被绑在木十字架上，敌人极其残忍地在他的左右肩胛用刀挖洞插上蜡烛，头顶插香点燃，并用火烧其心窝。但他毫不畏惧，高呼“杀死我一个，杀不绝共产党人，革命一定要胜利”，最后壮烈牺牲。他们用行动和铮铮誓言，生动展现了共产党员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的壮烈情怀。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真正的革命者没有被吓倒，他们仍然在坚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持斗争。一些追求进步的人士，也在革命最危难的时刻选择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如老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以及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总之，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发生了极大的逆转，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形势转入低潮，反革命势力一时间大大超过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但是，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原先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一个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激烈。因此，中国仍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们在等待下一个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7年，由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原本狂飙突进的国内革命局势陡然逆转，神州大地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两个根本性问题迫切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予以回答。经历了严酷的斗争，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戮，党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难以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也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面对敌人挥舞的屠刀，不进行武装反抗，无异于坐以待毙。于是，党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做出了明确的回答。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起义，并组成由周恩来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前往南昌领导和组织这次起义，同时，还决定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

1927年8月1日，在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分头行动，率领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部队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部队经过5小时的激战，全歼南昌守敌，占领南昌城。8月5日，根据中央原定的进军广东重建根据地的计划，起



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在反动派的层层堵截下，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遭遇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主要部分则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发言，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这次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②的任务，向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表明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为了扭转革命形势，八七会议后，党还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全国各地，以恢复和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并继续发动武装起义。

根据安排，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

①《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9-440页。

9月9日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朝着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进行转移。10月7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抵达江西宁冈茅坪。27日，起义部队进驻茨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到农村闹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再次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汲取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广州起义第一次公开举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并建立了第一个城市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持续了3天，就在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下宣告失败。起义军余部1000人于13日撤离广州，转进到海陆丰地区，继续革命斗争。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年初，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大多数由于敌强我弱、领导者实行错误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失败，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各地起义中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

016

前敌委员会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会为组织武装起义或重大战役设立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称为前敌委员会，也称作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前敌委员会在短时间内坚定贯彻中央的精神，做各项统筹工作，在不同时期、不同战役、不同地区的革命战争中起到了关键领导作用。

1927年7月下旬，为了领导即将举行的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这一专门机构，使之全面负责起义的筹备、组织、发动以及起义后部队的南下等各项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令，前敌委员会成员包括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后，立即与其他同志赶赴南昌，正式成立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负起领导起义的责任。

首先，前敌委员会确定了起义的政治纲领和土地革命的基本方针。在后期南下广东途中，前敌委员会还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制订、修改革命的具体政策，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做了开拓性的尝试。其次，前敌委员会抵制了张国焘取消起义的企图。在起义前召开的前委扩大会上，张国焘借传达共产国际最新指示的机会，反对举行起义，与会同志对他的做法进行了强烈抵制和反对，最终迫使张国焘同意了前敌委员会的意见，将起义照原定计划举行。再次，前敌委员会积极

筹划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为了加强军事上的领导，周恩来指派富有军事才能的刘伯承担任参谋团的参谋长，自己也在参谋团担任职务。而为了表达对当时还非共产党员的贺龙的信任，周恩来亲自赶到贺龙驻地，向他传达起义计划，并委任贺龙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

起义开始后，前敌委员会还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先前制定的战略计划，率领起义军南下广东。在肃清南昌守敌、占领南昌城后，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加以改编，并按照中共中央原定的行动计划，率领这支队伍朝广东进发，准备在潮汕一带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后来，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受挫，使得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前敌委员会执行中央指令的行动却是十分坚决的。前敌委员会成立后，除直接领导南昌起义外，还开展了其他很多工作，如成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筹集资金，领导起义军在瑞金击败敌军围攻，帮助赣南一些县区建立党的组织，在汕头建立地方革命政权，等等。

此后，不同时期的前敌委员会都对革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7年8月，按照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由毛泽东、卢德铭等组成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负责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红四军成立后，中央重新组织了前委。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在江西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成联合指挥的前委，作为联合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前委成员包括毛泽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朱德、潘心源、黄公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等17人，由毛泽东任书记。1929年前后，在湘鄂西苏区、左右



江苏区，中共中央也曾设立前委，分别由贺龙、邓小平任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各野战军党委作为中央代表机关，通常也简称前委。在一些重大战役中，还曾组织过总前委。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任书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组成辽沈战役总前委，林彪任书记。各个前委负责统一领导本级作战区域内党政军民的一切工作。

017

“左”倾、右倾

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人们习惯于按照革命态度的坚定程度，把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区分为左、中、右三派，用左来指代革命最坚决最激进者，用右来指代革命不坚定容易动摇者，用中来指代介于二者之间者。但在左派队伍中还有一种人，他们思想偏激、行为激进，往往因其超越客观的想法和十分冒险的举动给革命带来严重损失。为了与真正的左相区别，人们就把这一类“左”加上引号。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处在幼年时期的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指导思想上“左”的和右的倾向，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犯下了一些“左”的和右的错误。一般而言，“左”倾在政治路线方向上的倾向性表现为超越社会客观实际，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冒险和盲动；右倾在政治路线方向上的倾向性表现为认识和运动落后于实际，在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错失有利时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在政治路线上主要是出现了一次右倾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1926年11月，北伐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反共面目进一步暴露。为了分析革命联合战线



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于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决议案》规定，应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他们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的反动倾向作斗争。《决议案》认为，国民党左派虽然软弱动摇，但共产党仍应该团结他们、支持他们，依靠他们开展同右派的斗争。对于一些在口头上作出某些左倾表示的军官、政客，陈独秀等人也不加区分地把他们看作是可以依靠的国民党左派，不仅主张要把国民党的党政大权交给他们，甚至主张要让他们来领导群众运动。这种妥协退让的态度成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在日后时局突变的关键时刻带来了严重后果。

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7年11月，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观点，通过了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等决议。“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主要是：在革命发展阶段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在革命对象上，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同时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上，不承认中国革命实际上处于低潮，而认为国民党新军阀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由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发动城乡总暴动，直到形成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局面。在“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一些地区发生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这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损失，也让党

在这些地区严重脱离群众。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后，中国革命在低潮中奋起，出现了走向复兴的局面，加上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使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又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形势作出根本错误估计，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因而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并再一次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这些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无视革命力量的弱小，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虽然只有3个多月时间，但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却十分严重。国民党统治区内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被破坏，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而红军在攻打敌人统治的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尚未消除，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又开始在党内占了上风。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他们依然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作为同一项任务，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极力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他们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组织城市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主动出击，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坚决打击富农

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他们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他们又大搞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的统治时间长达4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之所以先后出现右倾和“左”倾错误，从思想根源上来说都是主观主义，都表现为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同实际相脱离。其结果是给党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有鉴于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他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①也正因如此，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教条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的现象，从一般意义上说，就是不研究事物的变化发展，忽视事物的特殊性，通过生搬硬套已有理论概念，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歪曲、错误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曾反复批评过教条主义者，说他们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①。

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大的伤害有两次：一次是在大革命时期，由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一次是在土地革命时期，由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造成的。究其根源，两次错误都是教条主义性质的，区别在于，陈独秀右倾路线是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而王明“左”倾路线是照搬俄国革命经验。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不从中国国情出发，而是照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提出中国革命的“二次革命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针对欧洲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能够担当起领导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状况，主张首先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3页。



和国，然后在资本主义有了高度发展以后，再由无产阶级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据此认为，中国革命也应该分两步走。事实上，中国的国情与欧洲各国完全不同，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很不发达，所以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十分弱小。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严重的软弱性，不能担当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重任。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放弃无产阶级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使得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党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也让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

1931年到1935年，党内又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王明主张照搬俄国革命经验，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一次完成两项革命任务，就像十月革命那样一步进入社会主义。王明的这一主张，又被称为“一次革命论”。王明还反对毛泽东主张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坚持照搬俄国经验，宣扬城市中心论，并否定中国革命中农民主力军的作用，在统一战线中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党内斗争方面，王明还照搬了斯大林和苏共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经验。从造成的后果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的破坏是全局性的，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是空前的。

在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两次革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这既纠正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错误，又否定了王明的“一次革命论”错误，实质上是反对照抄照搬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后，为了从思想根源上肃清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我们党又组织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

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也使党和人民获得了一个最宝贵的教训：中国革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需要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但任何时候都不能盲目照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机械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

019

左 翼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活动本来就极为困难，不断出现的“左”倾错误和关门主义方针又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严重损失，境遇变得更加糟糕。但就是在这样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其中，一批党的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他们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统治，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这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和这些在文化战线上积极投身革命的人，我们称为“左翼”。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由潘汉年负责，统一领导左翼方面的工作。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在上海正式成立了由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10月，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广泛开展革命文艺创作活动，兴起了一个极富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面对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把左翼文

文化视为洪水猛兽，采取了种种镇压和文化“围剿”手段，甚至认为文化“围剿”比军事“围剿”更重要、更迫切。他们一方面加紧对进步文化的封锁，查禁了大批社会科学和进步文艺书刊；另一方面也组织了一批英美派知识分子和反动文人，鼓吹西洋文明，攻击无产阶级文艺，宣扬拥护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这些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服务的资产阶级文人，我们称为“右翼”。

1927年10月，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上海定居，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他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主编《奔流》《前哨》《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写了大量战斗性极强的杂文，无情地揭穿地主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的面目、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残酷的文化“围剿”，并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文化界存在的种种错误倾向。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说过：“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

左翼文化、文艺工作者们还努力和中间派合作，共同进行战斗。鲁迅、瞿秋白、茅盾、周扬等人的文章分别在《申报》副刊《自由谈》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和《文学》月刊上发表。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1933年1月出版，三个月内重版4次。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田汉等通过明星、联华等影片公司拍摄了一大批进步影片，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大量观众。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是电通公司摄制的影片《风云儿女》中的主题歌，这首歌以时代的最强音，对动员人民奋起抗日救亡起到了巨大作用，迅速传遍祖国大地。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还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的中文全译本，最早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间世的。1930年，郭沫若所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这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战中，这些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纷纷撰文立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批驳了违反、歪曲中国社会历史和实际国情的种种错误观点。

虽然囿于当时的情况，左翼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曾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但这场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进程作出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唤起抗日救亡热潮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它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更是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文艺界的骨干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中国革命从高潮转入低潮，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继续推动中国革命，除了武装斗争别无他途。但是，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其主攻方向究竟是应该指向城市，还是应该指向农村，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之前并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先例。一定时期内，党内也曾认为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因此，虽然一次次失败，中共中央却选择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也仍然放在中心城市。但是，党领导和发动的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都失败了。而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大都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客观条件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广大农村，去坚持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指导原则，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初步地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6、7月间召开的党的六大，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左”倾错误思想，仍然把城市工作复兴视为



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但同时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9月，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①这充分说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

土地革命最早是在广东的海陆丰根据地开展起来的。1927年11月，彭湃领导建立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通过《没收土地案》，决定立即开展土地革命，通过没收一切土地、统一分配的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海陆丰的土地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如没收一切土地和“不革命不得田”等政策导致树敌过多，最终孤立了自己。其后，1928年春天起，井冈山根据地也比较早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农民分得土地的神圣权利，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到1930年上半年，安福、莲花、永新、宁冈、吉水、兴国全县以及永丰、泰和、万安等县的部分地区都分配了土地。与此同时，赣东北、湘鄂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2页。

西、鄂豫皖、湘鄂赣、广西右江、广东琼崖等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农民斗争从开始的烧田契、斗土豪，发展到了分配土地。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到1930年秋以后，各根据地没收、分配土地的对象和具体办法比以前更为明确，而且农民不仅取得了土地的使用权，还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而在3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我们党也形成了一套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革命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并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解决了红军的粮食问题，也极大地改善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的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得革命根据地的贫苦农民明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不同，分清了革命政权和反动政权的优劣，广泛地调动起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广大农民踊跃从事各项工作，参加红军或支援前线。仅在1930年9月至1931年3月期间，湘鄂赣根据地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就多达3万余人，广大农民还经常以粮、肉、鸡、鸭、布草鞋等物品慰劳红军。

在将革命进攻方向指向农村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成功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也将中国革命推进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立的 12 块革命根据地里，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回击，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情况的战略战术。

021

红色政权

1927年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然而，当时党内绝大多数同志还不懂得立足于中国国情和革命战争特点进行武装革命的重要性，而是奉行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道路和苏联的政权建设经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南昌起义到1928年党的六大前，各地党组织或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近百次武装起义，大都因为以弱小的起义力量与强大的敌人作一城一地的争夺而失败。这使得党和人民的力量又遭受到挫折。

在南昌起义的40天后，中共湖南省委计划组织举行秋收起义，决定夺取省会长沙，毛泽东负责前敌指挥。但秋收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在向长沙前进途中遭受挫败。毛泽东意识到要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当机立断实行由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战略。随后，他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到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与当地的农民革命相结合，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这实际上是在局部夺取农村政权，建立革命的红色政权。

红色政权通常选择的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也就是交通闭塞、地形有利的农村，在那里便于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结合。毛泽东认为，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础和主要内

容，但没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反之，武装斗争如果不与土地革命相结合，也必然会因为缺乏群众的支持而失败。同样地，只有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结合，却没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就没有依托；而没有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也无法建立和长期存在。因此，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必须结合起来，这也就是红色政权的全部内容。

中国共产党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及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教训，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一理论，为中国革命在城市遭到失败后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1930 年冬到 1931 年秋，国民党对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围剿”，军事上实行“杀死政策”，经济上实行“饿死政策”，企图使根据地“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虵蜥蚂蚁之通报”。根据地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品等日常必需品奇缺。但在广大群众的倾力支持下，红军采取正确的作战方针和灵活的战略战术，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把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根据地——中央苏区，其他根据地也发展到了相当规模。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为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代表大会分为中央、省、县、区、乡（镇）共五级。各级苏维埃代表均由选

举产生，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参加政权管理。同时还积极开展法制建设保障民主，先后颁布 120 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苏维埃法律体系，并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有效保障了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有序的政治参与。

面对国民党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红色政权领导下的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反“围剿”斗争准备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必要的物质条件。统一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建立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不断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坚持以粮为主、发展多种经营，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公营的军需工厂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这些措施有效缓解了军民生活必需品短缺的困难，保障了革命战争的需要。

022

苏维埃

“苏维埃”一词是俄文“Совет”的汉语音译名（英文为 Soviet），该译名最早是由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勱于 1918 年使用的。在俄文中，“苏维埃”一词原指“代表会议”或“会议”。俄国 1905 年革命期间，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政治组织。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中，各地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作为工农联盟的专政机关，与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存。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①。

作为政权的组织形式，“苏维埃”正式应用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崭新的苏维埃政权。1922 年 12 月 30 日，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联盟条约》和《联盟成立宣言》，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立。

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条“以俄为师”的革命道路，受此影响，苏维埃这一形式自然地接受和引入。1927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

^①《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 页。

务与策略的决议案》，指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①。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②

此后，中国共产党就把“苏维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接受下来，同时也把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将党领导的政权组织形式由原先的农民协会等转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是彭湃领导创建的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其后，在井冈山、广州、黄冈、麻城等地，党组织也纷纷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毛泽东为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为工农红军，最高政权机关是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同时设人民委员会和最高法院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从政权性质上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宣布“在苏维埃领域内，帝国主义的陆海空军绝不许驻扎”^③，主张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它还通过颁布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妇女法等维护劳苦大众的基本权利，通过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实现广大贫苦农民的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这样，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度，就逐渐地由地方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形式转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政体。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也是由此而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人民革命政权过程中进行的宝贵探索与尝试。也正是由于我们党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所以，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又被称为“苏区”。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口号。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①进入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于1937年9月正式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即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此，“苏维埃”不再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名称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023

反“围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和根据地的顽强存在和迅速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1930年10月蒋（蒋介石）、阎（阎锡山）、冯（冯玉祥）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立刻调集兵力开始向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进攻，组织了大规模的“围剿”，而党也领导红军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围剿”。

其实，红军在反“围剿”之前，还经历过国民党的“进剿”和“会剿”。“进剿”，是指国民党调动各省地方部队围困苏区的同时，以中央军为主力去进攻苏区。“会剿”，则是指国民党调动各省地方部队，联合发动对苏区的进攻。与以往对红军的“进剿”“会剿”不同，“围剿”是由蒋介石统一调动的反革命军事力量，同时发动中央军和各省地方部队进攻苏区。所谓“围剿”“进剿”“会剿”，都是国民党的用语，因此，我们在使用时给其加上引号。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多人，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人，成功打破了第一次“围剿”。随后不久，蒋介石又指挥2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

剿”。红一方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方针，于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连打5个胜仗，自赣江至福建建宁，横扫700里，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6月间，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再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并将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受红军胜利影响，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1.7万余人，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南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引起了很大震动。与此同时，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形成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等战略战术思想。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了红军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

1931年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1932年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也被错误撤销。但周恩来、朱德坚持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再次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创

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当时党的最高总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而是沿袭国外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在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战术，同装备精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越来越陷入被动。1934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面对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实施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024

敌后战场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形成了两个战场：一个是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另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抗战初期，敌后战场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挑起中国抗日战争的重担，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对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

为了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在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认为在抗战初期，由于敌强我弱，在军事上单靠正面防御是不行的，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还必须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而由于敌小我大，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日军在中国占据的地域越大，其兵力就越不足，不可能全面控制中国，只能是控制主要交通线和城镇。这样，敌后广大乡村地带就成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理想区域。而人民军队只要深入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就一定能够发展壮大为抗战的火种和骨干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人民抗日武装，开辟与正面战场相配合的广阔的敌后战场。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要坚决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

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战略任务。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大部溃退到黄河以南、以西的地区。至此，在华北地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积极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八路军115师、119师、120师和山西新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地区的敌后分别展开。八路军部队同地方党组织相结合，组织工作团，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这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

自1937年9月八路军初战平型关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共发动对日军的作战1600多次，毙伤日军6万余人。当时，敌后战场抗击日军兵力40万人，占到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8%。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苏南、淮南、豫皖苏边区等24块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在战略上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使得日军占领的地区只能是局限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兵力越来越分散，迫使日军停止了战略进攻。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日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客观上加快了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提前到来。日寇在占领武汉后，之所以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重点打击对象由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



在正面战场停止了战略进攻，企图以此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应地，日军在军事上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战场。受此影响，国民党也由抗日之初的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

从百团大战结束后的 1941 年起，抗日战争进入完全的相持阶段，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了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彻底打乱了侵华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变战略被包围为战略反包围，对日军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形式，正是弱国坚持持久战的最佳形式。

在 1941 年至 1943 年间，国民党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反共高潮，尤以“皖南事变”为甚，使抗日战争出现了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侵华日军趁机转移其主要兵力来巩固其占领区，并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从此，中国抗日战争的重担几乎完全落在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上。英勇的敌后根据地军民与日军进行了异常艰苦的反“扫荡”作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实践证明，洛川会议作出的开辟敌后战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实行敌后抗战，使日军不得不用相当大的兵力，用于保守其占领区，这对兵力不足的日本来说是极其严重的威胁。同时，敌后抗战能有效地聚集和发展人民抗日力量，使原本有强烈自发性抗日要求，但十分分散、难以持久的抗日团体和组织，有了强大的凝聚力。

025

持久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在国内有相当大的市场。在国民党营垒中，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也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在共产党内，“亡国论”是没有的，但盲目轻敌的思想还是存在的。与持“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人相比，在全国抗日阵营中，多数人都认为抗战将持久地进行，并且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但对于持久战的认识和如何进行持久战的理解却大相径庭。

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全民族抗战开始以来十个月的经验，写下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中，毛泽东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就为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和持久抗战，明确了军事战略方针。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①战争过程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具体地说，战争爆发前，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具有很强大的战争力量，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而中国不能取得速胜。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是一场疯狂的战争冒险，这只会加剧其内外矛盾，使其走向灭亡。而且日本是小国，缺少支持长期战争的人力、物力。虽然日本也得到了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但由于它的侵略扩张政策威胁和损害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必然会受到国际反对力量的遏制。这些都是日本自己无法克服的短处。与日本相反，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②。因为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所以能够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能够利用中国地大、人多的有利条件来支持长期的战争，并将得到国际上的广大援助。所以，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亡国论”者是错误的，他们只看到敌人军事力量强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敌人的根本弱点和中国的优势；认为抗战很快就能取得胜利的“速胜论”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2页。

也是错误的，他们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也不了解日本的短处需要一个长时期才能充分地暴露出来，而中国的长处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分析这三个阶段时，毛泽东着重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和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各种因素，论述了相持阶段是持久战发展到最后胜利的“枢纽”。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也是三个阶段中时间最长的，中国抗战力量的生长主要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游击战将取代运动战和阵地战，成为我方主要的作战形式。经过相持阶段的努力，中国的力量将转弱为强，在敌我力量对比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后，抗日战争就能够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了。而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运动战又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合理设想，体现了他对抗日战争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在全民族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毛泽东就描绘出了这个战争过程的基本轮廓，并被实践证明是对于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正因如此，毛泽东对持久战，特别是对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论述，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起到了正确战略指导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026

顽固派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存在着两个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会否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到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抗战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

国民党内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从七七事变起一直表示坚持抗战，但当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他们却对抗日采取消极态度，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甚至指令国民党军队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对这个置民族大义于不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集团，我们称为国民党顽固派。

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抗战的过程中，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尽量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所谓斗争，就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针锋相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我们党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斗争作为团结的手段，把团结作为斗争的目的，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突

然事变。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在山西，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1940年2月起，国民党军队进攻晋东南和晋南抗日根据地，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在总结反摩擦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①的策略总方针，不但在军事上消灭了来犯之敌，还反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收敛反共活动。1940年9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在江苏向黄桥新四军无理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10月上旬消灭国民党军队1.1万人。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起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系列反共行动的组成部分，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面对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共产党这种坚决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力量、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的意料，他们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1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并约请周恩来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



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仍然采取避战观战为主和限共反共的政策。1943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暗示要消灭共产党。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借当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重兵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止。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这表明党已逐步成为成熟的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领导集体。而中国共产党人在突然事变前既不惊慌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和抗日的势力以借口，而是坚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党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

027

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作战的重点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政府也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得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状况日益困难。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中说：“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①

当时，日军沿黄河沿线屡屡进犯，国民党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并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狂妄叫嚣要“饿死，困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连续3年遭受多种自然灾害，没有粮食，生活窘困。而附近战区灾区的灾民难民、海内外仁人志士及部队的集结，又让延安人口数量在短时间内成倍增加。生存问题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党要领导抗日军民独立坚持长期敌后抗战，就必须加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离开了这个前提，支撑抗日战争、改善人民生活 and 巩固抗日民主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1938年10月，为了克服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困难，陕甘宁边区留守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7页。



部队开展了生产运动。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作出“自己动手”的伟大号召。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在1941年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此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从广义上讲，大生产运动从1938年留守兵团开始农副业生产以解决部分生活生产所需开始，到1947年春中共中央安排好春耕后离开延安止，前后长达9年之久。而狭义上所讲的大生产运动，专指1941年至1945年的生产高潮时期。

大生产运动确立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边区和根据地都处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地区，针对这些特点，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生产事业中以农业为主，促进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确保“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坚持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在组织经济中，开展合作互助、生产竞赛并奖励劳动英雄；等等。

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为深入推动这项运动，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产，要求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鼓励种植经济作物。1941年3月，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第359旅开赴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南泥湾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部队官兵和随行家属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自己动手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学习

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并涌现出了许多“气死牛”式的模范人物。从旅长王震到工勤人员、随军家属，全旅上下人人动手开荒种地，把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好江南”。

与此同时，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毛泽东在自己居住的窑洞下面开垦一小块地，种上了菜；朱德也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三亩菜地；在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的纺线比赛中，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的行动，鼓舞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方面人员数万人，都投入到大生产的热潮之中。

在陕甘宁边区之外，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也明显改善军民生活。1941年，陕甘宁边区农民交的公粮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年降为11.14%，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逐年下降。^①1942年到1944年期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做到“耕一余一”。^②从1943年起，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一般都能自给自足两个月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00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29-230页。



大生产运动为抗日根据地度过严重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巩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敌后长期艰苦的抗战，乃至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党还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但其从问世之日就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当马克思、恩格斯还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时候，他们已经关注到了中国。马克思研究了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历史，撕破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伪装，向当时的世界揭露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他写道：“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①。马克思不仅同情饱受蹂躏的中国人民，而且对中国革命寄予厚望，认为中国革命甚至可以带来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推动世界革命的浪潮。

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②，表达出对中国革命拨云见日的欣喜。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马克思主义自东面的日本、北面的俄国、西面的法国传入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成为最早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其后，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担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3页。



兴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开放的理论，是可以用来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理论。作为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中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历史上，有的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标榜他们代表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凭着共产国际的决议狐假虎威，企图完全照搬苏联经验，结果让中国革命遭遇重大挫折，几乎陷入绝境。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坚决纠正“左”倾错误，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强调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使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这就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做了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②。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理论创造是为了服务于现实，是为了解决和回应现实难题。只有实现中国化，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1页。

运用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彰显这一理论的强大力量。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①他还说过：“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②“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新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从新的实际出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新发展。习近平指出：“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①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5 页。

无产阶级只有建立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先进政党，才能最终完成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早在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建党学说的基本观点，论述了党纲、党章、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任务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①。

19世纪后半叶，俄国阶级矛盾尖锐，面对这种情况，列宁于1895年和1896年分别起草了《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和《党纲说明》，这也是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建党纲领草案及说明。1898年3月，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地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在明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但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党章，也没有建立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02年，列宁又写了《怎么办？》，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建党学说，阐明了俄国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坚强组织纪律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的战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自俄国26个地方组织的43名代表出席了大会。这些代表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包括以马尔托夫为首的《火星报》编辑部中反对列宁的“温和派”和“经济派”分子及其支持者。在讨论党纲及组织原则问题上，代表们分成两派，马尔托夫等人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列入党纲，列宁对此给予驳斥，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必须写进党章。列宁的主张赢得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支持。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是此次代表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在表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委会人选时，拥护列宁主张的一派获得多数选票，被称为“多数派”（俄文为“Большевики”，中文音译“布尔什维克”）；支持马尔托夫的一派占少数，被称为“少数派”（俄文为“меньшевик”，中文音译“孟什维克”）。从此，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领导权。

布尔什维克的出现，标志着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1904年年底，俄国成立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中心——多数派委员会党务局，并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前进报》。

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公开分裂，大会通过了将孟什维克开除出党的决议。布尔什维克从此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简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正因如此，人们以后就常常把共产党或共产党人称为布尔什维克，把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自从有了布尔什维克，俄国

工人运动面貌开始焕然一新。^①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以列宁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胜利前进的方向。

191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简称俄共（布）。1925年4月，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俄国共产党（布）又更名为苏联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1952年，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共产党（布）再次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对各国支部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建设目标。“布尔什维克化”，核心就是马列主义化、无产阶级化。这一口号引起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注意。1921年夏，恽代英召集利群书社的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会议期间，经过热烈讨论，全体成员一致赞成组织新式的党——波（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建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作“波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进行自身建设。1939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在为创刊号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指出，办这份党内刊物并定名为《共产党人》，是因为

^① 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①，而这是“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②。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总结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和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花了两天的时间专门作了《关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的讲演，逐条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并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系统阐述了怎样使我们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特别是重点批判了党内存在的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倾向，指明了使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必须解决好的若干问题。

使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实质上就是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体现党的先锋队性质，把党建设得坚强有力。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接续推进。通过独创性地解决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的特殊矛盾和复杂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幼小到壮大，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以及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新变化，都表明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独立，不能再走以前的道路，也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只能以适合中国国情的更先进的理论为指导，依靠更先进的阶级去完成。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适应了中国革命的这一实践需要而得以形成的。

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将中国革命汇入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新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经验更为丰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更趋成熟，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

大盲目性的。”^①可见，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后来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具体地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在政治上，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②。在经济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③。在文化上，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④。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述，不仅回答了时局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和未来新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党的基本纲领联系起来，并分别作了具体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的内容，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①。新民主主义纲领和革命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具体奋斗目标。

总之，自无产阶级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革命就已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成为新的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集中表现在：中国革命不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领导力量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指导思想不再是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学说，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前途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称新民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页。

主义社会。这一时期，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但在经济基础上，除国营经济外，还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经济成分，且国营经济并未占主体地位。新民主主义社会要继续向前发展，就要不断扩大国营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通过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于1956年年底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031

整风运动和整党运动

重视和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时期进行了多次整党整风运动，对于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延安整风运动开了我们党历史上大规模整风运动的先河。遵义会议后，党的政治路线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为了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也为了克服大量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他们是整风运动的重点对象；另一个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其中，高级干部整风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



际相结合的原则，尖锐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7月和8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规定》，进一步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党的团结，遵守党的纪律，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

从1942年春天开始，全党进入普遍整风阶段。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阐明了整风运动的任务和方针。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要克服主观主义，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其中，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也是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整风运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让广大党员阅读文件、检讨思想、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法，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实现了高度统一。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的系统总结。《决议》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段时间党的历史和基本的经验教训，阐述了“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及其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高

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作出的巨大贡献，标志着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1947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党的党员人数已达到270万人。党组织的扩大，一方面增强了我们党战胜敌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党员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状况。1947年至1948年，各解放区党组织密切结合土地改革进行整党。整党内容主要是“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这次整党运动成效明显，基本克服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官僚主义作风，巩固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从而使土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激发了广大农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热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上渐渐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腐化变质等现象开始出现和蔓延。为此，从1950年6月开始，我们党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党整风运动。在这次整风中，广泛采用了群众监督及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以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法。在此基础上，从1951年开始，又用了3年时间对全体基层党组织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整顿。通过整风整顿，纯洁了党的思想和组织，广大党员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马克思主义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党的革命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为顺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及社会主义改造起了重要作用。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然而，由



于“文化大革命”的流毒一时之间还未完全肃清，有些党员对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缺乏正确认识，使得改革开放事业在有些领域进展缓慢。从1983年10月开始，我们党开展了一场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四项任务的整党运动。通过这次整党，“文化大革命”的流毒被彻底肃清，党内政治生活得以净化，使全党再次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高度一致，为党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保证。

032

反“扫荡”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非常困难的时期。在这一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成支撑它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集中了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野蛮的侵略政策。

当时日军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日占区）、“准治安区”（中日双方军队争夺的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日占区，日寇采取“清乡”政策，建立和加强汉奸组织，组织“自卫团”“守备队”“治安军”，强化保甲制度，实行“十户连坐法”，搜捕共产党员、抗日八路军、地方部队、民兵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反日运动，并垄断和吞并工商业，对战略物资进行统制，勒令种植鸦片，大肆压榨劳工等。此外，日寇还对占领地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针对“清乡”政策，党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装工作队，摧毁伪政权，打击汉奸组织。在游击区，日寇主要实行“蚕食”政策，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和岗楼，缩小抗日根据地范围，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日占区。针对“蚕食”政策，党采取“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趁着日军立足未稳，给其以迎头痛击。对抗日根据地，日寇则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大“扫荡”



(“扫荡”为日本侵略者的说法，故我们在使用时给其加上引号)，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1年到1942年，在“扫荡”华北根据地时，单次使用兵力在千人到万人次的达到132次，万人至7万人次的达到27次。在同一地区的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并制造了“潘家峪惨案”“五一大扫荡”等骇人听闻的侵略惨案。针对日寇的“扫荡”，抗日军民创造了很多极其有效的歼敌方法，比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还创建了武装工作队等新的斗争力量，充分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麻雀战主要在山区实行，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民自卫武装时聚时散打击敌人。在平原上，广泛开展破袭战和地道战，敌后军民在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行进，并建立村村相连、能打、能机动转移、能藏的巨大地道网，做到了有效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不管是在山区还是在平原，都普遍运用地雷战，敌后军民自己动手、就地取材，把各种各样的地雷埋在日伪军有可能涉足的各个地方，对日军的“扫荡”行动造成了较大的打击。水上游击战主要是在河湖水网地带进行，敌后军民利用河湖港汊的复杂地形，筑坝设障，使日伪军作战船艇难以行驶，而军民作战使用的小船则可以出入自由地寻找机会痛击日伪军。武工队是军队、政府和人民相结合的精干的战斗组织，是一种为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活动而创造的新的斗争力量。在敌占区，武工队通过广泛地发动群众，将军事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破坏瓦解敌人的统治秩序和组织，把日伪军的心脏地区变成了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多种多样的作战形式，使日本侵略者陷入到反“扫荡”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时期，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反共摩擦，并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和根据地的援助。在这种内外皆困的情况下，到1942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以及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在数量上都有所减少，敌后抗战遭遇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给抗日根据地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941年到1942年间，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民兵共计作战4.2万余次，击毙、打伤日伪军33.1万余人次。敌后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不仅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最重要因素，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支持。

033

民主联合政府

1943年下半年至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在我国，敌后战场的侵华日军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打破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开始在局部进行反攻。然而，在这大好形势下，国民党的统治却更加腐败和倒退，国统区民怨沸腾，遭到国内外舆论强烈谴责。特别是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退，使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无能表示出失望和愤慨，纷纷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在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表示要开放民主，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但同时又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坚持其一党独裁统治。

面对历史潮流和人民呼声，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建立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抗日民众团体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林伯渠讲，只有坚决地变革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机构，才能团结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必须立即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新的民主联合政府。随后，中国共产党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党当

局提了出来。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经《新华日报》刊布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欢迎，他们纷纷集会和发表文章，表示赞同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1944年9月24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代表张澜、沈钧儒、冯玉祥、董必武等500余人在重庆举行会议，呼吁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1日，在追悼文化界爱国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上，各界人士近千人再次提出要同法西斯独裁统治作斗争。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大学的师生纷纷举行国是座谈会，一致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旅居各国的海外侨胞也发表宣言，举行集会，拥护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作了系统全面的阐释。大会强调指出：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和要求。^①这一主张的提出，广泛地团结争取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以及国内外各种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希望中国民主进步的力量，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更加孤立和被动的地步。

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阶级本质决定了其独裁专制的统治。对中国共产党，他们从来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53页。



必欲除之而后快。蒋介石集团虽然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但事实上却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从根本上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他们从一开始就坚决抵制。

抗战胜利后，美国派出了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纷争。他的到来，使中国人民看到和平建国的一线曙光。然而，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使马歇尔不得不肩负双重任务，即一面“调处”国共纷争，一面又支持国民党政府。因此，美国一方面竭力调停国共关系，希望中共主动参加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则给国民党提供发动内战所需的物资和军事的帮助。这种帮助使国民党反动派相信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迅速消灭共产党，因而在1946年7月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使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希望化为泡影。

034

政治路线

我们党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根据形势和任务提出过不同的纲领，并在政治路线上具体得到体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①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②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在1979年7月29日作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新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



形势和任务，明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①，必须坚决捍卫、坚定执行。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最早是在党的十三大上明确的，后来经过党的十七大和党的十九大的完善，最终被确定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②。其中，奋斗目标中的“和谐”是党的十七大增加的内容，“美丽”是党的十九大增加的内容，党的十九大还把原来目标中的“现代化国家”提升为“现代化强国”。这样，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提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从而扩展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内涵。而“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是我们的兴国之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回答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保证问题，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是我们的强国之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实现奋斗目标的根本立足点。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也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一个中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96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0 页。

心、两个基本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基本途径，二者是一个整体，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内在要求，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和发展道路。

在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其他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特别是近几年，我国面对更加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此时，全面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就显得尤为重要。

今天，我们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努力。全党制定执行大政方针，要从党的政治路线出发；部署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重大战略、重大任务、重大工作，要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确定工作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要自觉同党的政治路线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要坚决同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政治路线的言行作斗争。^①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97页。

035

共同纲领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人民团体在北平（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商国是。其中，制定一部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接受和遵守的共同纲领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对于将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我们党早就在筹划。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会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新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有关建国的各项大政方针一直在加紧酝酿。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革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规定了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发展方向。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文章构成了制定共同纲领的理论和政策基础，规划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其后，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委托中国共产党负责并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建国纲领，即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在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几经修改，提交政协全体会议讨

论。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人民大宪章。

《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由序言、总纲、政协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部分组成，共8章60条。

《共同纲领》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是新中国的国体。它在总纲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实行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关于新中国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从那时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成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同国体、政体相适应的，还有适合中国国情、反映中国革命特点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它在中国人民心中树立了极大威信，在各种革命力量中确立了领导核心地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过相互合作，反复比较，慎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确定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及经济构成的总框架下，《共同纲领》还明确：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的组织形式。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统一的军队。在经济上，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在文化教育上，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为主要任务。在民族政策上，坚持团结互助，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共同纲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来的一部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它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同时，又在基本大政方针上同党将来制定社会主义的纲领相衔接。《共同纲领》既经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便名副其实地成为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建设蓝图。可以说，它是一部真正立足于中国实际、切合人民需要的行动纲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共同纲领》成为规范和衡量一切党派、团体和个人的行为活动的共同准则。^①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6页。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036

独立自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自那时起，独立自主就成为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解放战争后期，建立新中国的任务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如何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一方面，要在美、苏冷战的国际环境中保证新中国的诞生和巩固；另一方面，要割断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对外关系。

为了从根本上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外交划清界限，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1949年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新中国的外交问题。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规定：“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被正式确定为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所谓“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是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掉，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再让外国客人进来。“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新型的对外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1949年4月，周恩来对来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和北平一些大学教授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①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又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②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③这就为新中国的外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8页。

交政策确立了“独立自主”和“维护和平”的主基调。

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准则。在一切外交问题，我们都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从不拿原则做交易，也绝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与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我国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中，仍然注意保持自身的独立自主地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毛泽东认为，中国与苏联结盟的目的是使中国革命不致处于孤立地位，使帝国主义国家不敢轻举妄动，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要听命于苏联。在这之后的岁月里，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对来自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也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指出：“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①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把独立自主处理对内、对外事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

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根本的出发点。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概念，并从十个方面阐述了其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及中国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的战略选择和郑重承诺。”^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加奋发有为，但我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没有变。我们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独立自主决定自己对国际事务的态度、立场，制定自己的外交策略，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

① 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037

土地改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土地制度极不合理，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发展。要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首先就要进行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扫除封建剥削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实行“耕者有其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农民的个体经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其中，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主要内容。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政权后，就开始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1928年年底，根据井冈山地区一年来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湘赣边区政府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该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14页。

随着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也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1929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到达江西兴国后，又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这个新的土地法，将之前《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①。同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要没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没收其土地也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大小商店应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还规定，分田时（在原耕地基础上）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可重新瓜分。

通过大力开展土地革命，到1931年年初，各革命根据地内基本解决了之前长期没有处理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还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将之前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据此，各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经过一年多时间，解放区2/3的地区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页。

本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1947年7月至9月，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进一步激发他们参加和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党的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①。此后，各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掀起“保田参军”土地制度改革（习惯称“土改”）运动的热潮。

在1948年4月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土地制度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作了完整表述，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②“土改”运动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激发了中国最主要的人民群众——农民的革命热情，使广大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人力物力保障。

新中国成立前夕，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国家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页。

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①。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内设土改委员会和组织各级农协直接领导土改运动的指示》。同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其中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②据此，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我们党领导农民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土地制度改革。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到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使农民从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使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推进，还确立起了贫雇农在中国农村中的优势地位，为引导亿万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也有力地巩固了工农联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5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页。

038

镇压反革命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还存在着不少敌对力量，他们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危害着新生的政权。这些反革命力量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遗留的 200 多万政治土匪，以及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此外，还有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如遍布城乡的“一贯道”、北京的“九宫道”等。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力量更加嚣张，大肆造谣惑众，扰乱社会秩序，认为颠覆人民政权的时机已经到了。为了镇压这些反动势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党和政府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镇压反革命，最初主要由公安部门集中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搜捕。通过破获大量特务间谍案件，初步安定了社会秩序。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干部存在麻痹轻敌思想，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片面理解为“宽大无边”，使一些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应有制裁，让群众感到不安。针对这些情况，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为了建立稳固的后方环境，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中央于 1950 年 10 月 10 日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单位准确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立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的“宽大无边”偏向，对已经逮捕及尚未逮捕

的反革命分子，应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加以处理：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制裁的，使人民群众感到不安的，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宽大处理仍然继续作恶的，按罪该杀的应当处以死刑，该监禁和改造的应当立即逮捕监禁，给予改造；对于罪行较轻而且本人又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的下级党务人员，应当实行管制；对于胁从分子、自动坦白分子和在反革命斗争中有贡献的分子，应予以宽大待遇或适当奖励。按照这一指示，国家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对进一步开展镇压反革命斗争重新做了具体部署。1950年12月起，全国各地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为了更好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央确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路线，即：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要把公安、司法等专门机关的工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密切结合起来。为此，毛泽东还专门提出了“稳、准、狠”的工作方针。^①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为镇压反革命斗争提供了法律武器和统一的量刑标准。自此，各地群众纷纷行动起来，检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举揭发和协助政府追捕反革命分子，在全国城乡遍布天罗地网，使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曾参与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杀害赵一曼、刘胡兰等革命志士及爱国民主人士的日伪、特务、反动军官等，尽管伪装身份、改头换面，隐藏得很深，但还是被追查发现和揭发检举出来，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截至 1951 年 10 月底，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到 1953 年秋，少数不彻底地区的扫尾工作也全部完成。一批对人民、对国家犯有严重罪行的匪首、惯首、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及反共地下军头目等被关押、管制或受到镇压。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敌我矛盾还很突出、新生政权尚不稳固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尖锐的对敌斗争。虽然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完善，在一些地方出现了错捕、错杀等偏差，但党中央及时发现并进行了纠正。总体来看，镇压反革命运动消灭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会道门等反动组织，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恢复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039

“三反”“五反”运动

在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为了前线的胜利，国内工业和农业战线上广泛开展了爱国增产运动。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为了继续坚持抗美援朝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①为此，毛泽东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并在全中国掀起了一场以增产节约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随着运动的开展，一方面涌现出大量的模范人物和先进典型；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些机关内部存在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的贪污行为，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警告全党：“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①在党政军三个系统，中央分别成立各级增产节约检察委员会，运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制定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检查贪污浪费现象。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在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依法被判处死刑一案，对全党起到了重大警示作用。

1952年年初，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又先后颁布了《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进一步规范和推进“三反”运动。根据运动中发现的问题，中共中央指出要加强“三反”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和健全财政、基建等各种制度，防止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的重新生长。

“三反”运动是党在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以后，为保持党政机关廉洁、反对贪污腐败进行的初战。这场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取得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

了明显效果。同时，“三反”运动还是一场群众性的社会改革运动，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清理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树立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另外，通过发动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参与，也使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爱护国家财产等新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形成。

在“三反”运动中，各地各部门清查出一一些党政机关内部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资本家内外勾结、侵吞国家资产的案例。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斗争的同时，在工商业界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通称“五毒”）的“五反”运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资产阶级在这些方面的猖狂进攻给予一个坚决的反攻和重大的打击。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1952年2月，“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了高潮。

1952年10月，全国范围内的“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当时党内和社会中存在的违纪违法现象，在清除旧社会污毒方面也发挥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在定案处理过程中也得到了纠正。^①

^① 参见半月谈杂志社《时事资料手册》编辑部：《简明中共党史辞典》，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

040

五年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为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国效仿苏联的做法，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在1951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准备从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在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主持下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经过近四年的补充和修改，草案于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决定1953年到1957年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

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1953年12月，我国重工业建设中首批投产的重要工程——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开工，其后，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开工。“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苏联共帮助我国设计和兴建了156个（后增至166个）重点建设项目。到1956年，我国第一个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第一个制造机床的沈阳机床厂建成，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试制成功，第一座长江大桥在武汉开始修建，康藏、青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

到1957年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多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并开始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同时，也较好地解决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关系问题，如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问题，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问题，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问题，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等。从此，这种以每五年为一个计划单位的方式开始被用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当中。

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二五”计划到“四五”计划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或破坏。从1976年“五五”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恢复正常。在1981年开始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我国取得财政经济根本性好转的胜利。在1986—1990年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制定了完整的社会发展计划。1991—1995年是我国第



八个五年计划，以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1996—2000 年是我国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主要任务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1—2005 年为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此后，“五年计划”调整为“五年规划”。2006—2010 年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是我国进入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五年。2011—2015 年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主要是在保证经济平衡较快发展的同时完成经济结构战略性的调整。2016—2020 年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是我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任务的决胜阶段。

“十三五”时期，我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5575 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 13000 亿斤以上；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城镇新增就业超过 6000 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10 亿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军队组织形态实现重大变革；国家安全全面加强，社会保持和谐稳定。^①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四五”规划。这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3 页。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中，我们党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等方面提出了新发展目标，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胜利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041

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的 1949 年到 1952 年，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国国民经济基本得以恢复，国家的经济政治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认为，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已经到来。1952 年 9 月，毛泽东提出，计划用 10 年到 15 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开始。

在 1953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于同年 12 月形成了关于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

这条总路线的主要内容也被概括为“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用一只鸟来比喻，“一化”就是鸟的“主体”，“三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版，第 602 页。

就是鸟的“两翼”，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条总路线既包括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紧密结合，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我们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有其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如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在他们看来，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首先要夺取政权，然后立即利用国家政权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消灭私有制，确立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也是一切走向共产主义的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对于如何变革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暴力没收与和平赎买这两种方式，并认为用赎买的办法变革所有制是“最便宜不过的了”^②。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曾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但是由于俄国资产阶级选择了国内战争的反抗方式，列宁的设想未能实现。

1953年12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毛泽东审阅的《为动员一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页。

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历史时期之所以必要，并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是由于：一、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要求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创造为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所必要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二、我国有极其广大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及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一部分比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改造它们。”^①在审阅这个提纲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只有完成了这个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才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利于增强国防力量，最终才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全面实行开始于 1953 年，中共中央在当年先后作出两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规定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到 1956 年年底，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 96.3%，中国农村完成了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

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从 1953 年 11 月开始至 1956 年年底，党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用说服、示范、国家援助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版，第 600 页。

的方法，启发和帮助手工业劳动者按照自愿互利原则逐步组织起来。通过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形式，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实现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年底，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由个体私有制变为集体公有制、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至1956年年底全面进行，前后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第三步，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同时，通过实行“和平赎买”政策，也使民族资产阶级从剥削者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党在历史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尽管原定15年左右完成的任务实际上只花了4年多时间，特别是在后期存在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等失误和偏差，但总体来看，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可谓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042

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而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在发挥原有工业潜力和进行新的工业建设的同时，对个体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此，我们党制定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开辟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我们是秉持自愿互利的原则，采用示范、说服和国家援助的方法，通过合作化方式逐步完成的。据1956年6月的统计，“全国一亿二千万农户中，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已经有一亿一千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一点七。其中，有三千五百万户加入了初级合作社；有七千五百万户，即大多数，加入了高级合作社。畜牧业中的互助合作运动，也已经有了发展”^①。

在推进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党和政府还有计划、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有步骤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和平改造，就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有步骤地把一切对国计民生有利而又为国家所需要的资本主义企业，首先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的。所谓赎买，就是国家在一定年限内，让资本家从企业经营所得中获得一部分利润，有偿地将私营企业改变为国营企业。这既利于发挥私营工商业在国计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也利于保持社会稳定。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致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1953年到1955年夏，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阶段，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用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一方面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另一方面也开始把它们的生产 and 经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企业利润分配上，按照国家所得税、工人福利费、企业公积金、资方股息红利这四个方面进行，即“四马分肥”，其中国家所得税占30%，工人福利费占15%，企业公积金占30%，资方股息红利占25%。通过这种方式，限制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提高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从而使企业具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

第二步主要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也即高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仍然按“四马分肥”的政策分配企业利润，但资本家只能按私股所占比例取得红利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红利转为国家所有。同时，国家派干部（公方代表）与资本家（私方代表）共同管理和改造企业，并让公方代表居领导地位。这样，进一

步限制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使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因而使企业具有了半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步是从 1955 年下半年到 1956 年实行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高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到 1956 年年底时，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 99% 和私营商业户数的 82% 分别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这表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通过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大陆地区基本上铲除了剥削制度，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的最终目的，是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历史表明，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国家，短期内完成了三大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且总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也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人民的团结，这无疑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正如邓小平评价的那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①

^①《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02 页。

04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殖民体系分崩离析，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大批国家获得新生，渴望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但当时的世界并不太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冷战带来的新的战争阴霾也还笼罩在世界人民头上。在此背景下，中国、印度、缅甸等饱受侵略与战争苦难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稳定、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共同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早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就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①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1953年12月31日，在中印两国政府谈判关于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问题时，为了表明新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原则立场，周恩来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①以这五项原则为指导，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达成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1954年6月下旬，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经过友好协商，中印、中缅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并且首先在中印、中缅之间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中国和印度妥善解决了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中国和缅甸顺利签署了边界条约。这一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世界各国和平解决争端作出了示范，开启了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了亚非二十九国首脑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在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时，周恩来力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求同存异”。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通报》，其中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则，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外又增加了五项原则：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利益服务；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等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防争端；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提出，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并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社会所公认与接受。究其根本，是因为它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突破了意识形态束缚，反映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体现了平等、和平、互利等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由于能够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间的关系，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中，正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视作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为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文件所采纳，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同和遵守。

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有力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2014年6月，习近平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①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中国将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各国一道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共同安全、坚持共同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包容互鉴、坚持公平正义，携手谱写人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篇章，共同建设和谐、美好的新世界。

^①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04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必须充分考虑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条件。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表明，不论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在中国都行不通，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政治制度脱离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我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

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为建立新型人民政权进行了不懈探索和艰辛实践。1931年，中共中央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同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标志着新的红色国家政权在世界的东方诞生。1937年，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是我国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为人民民主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1947年11月，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在各解放区相继建立起来。1948年8月，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两个根据地合并，用推选办法

选举出 541 名代表，在隆隆的炮声中选举产生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临时政权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身。1949 年 9 月，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庄严宣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基础上得出一个历史性结论，即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3 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普选活动，并自下而上逐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1954 年 9 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①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迫中止。“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国各地逐步恢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82 年 12 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颁布了我国新的宪法，为加强我国权力机关的各项建设工作提供了根据：一是将部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转移给人大常委会，扩大了人大常委会的职能范围。二是健全了人大及常委会的组织构架，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经常性工作能得到更好处理。三是恢复“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设立的国家领导人构架，包括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四是针对其他党派人士加强民主建设工作，确立各个民族自治区的自治制度，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51 页。

为香港与澳门的回归做好基础。五是细化整个国家的组织构架，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和各个地方政府的职能。这些有效措施，使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在我国，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依法产生和运转其他国家机关，并对其进行监督，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得到正当行使。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制度载体。党的领导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重要的制度载体，通过法定程序，将执政党的主张转化成为国家意志，在国家制度层面有效保证党的执政地位；使党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机关领导人，使党组织的优秀成员代表进入国家政权机关并取得主导地位，依法实现党对国家事务领导。最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制度平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是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其中每一方面都离不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功能的有效发挥。

7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与活力，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习近平指出：“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①新形势下，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①《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载《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5日。

045

政治协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其中，多党合作制度是指，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①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具有参政党的地位，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参与执政；政治协商制度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举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

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大胆运用协商等形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提出了“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主张和长期与党外人士协商合作的理念，并进行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②建设。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也曾与中国国民党以及民盟、青年

① 八个民主党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② 在“三三制”政权中，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党、无党派人士在重庆召开过政治协商会议。但后来国民党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遂使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解体。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公开发出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聚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李章达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其后，在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也发表宣言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共634人，来宾300人。这次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主要任务是讨论制定并通过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民主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9月30日下午会议闭幕，会议选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澜、李济深等180人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人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63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建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政治协商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会议分别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统一战线长期存在、民主党派长期存在，人民政协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行之有效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政治协商，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形式：一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就中共中央将要提出的大政方针问题进行协商。这种会议一般每年举行一次。二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根据形势需要，不定期地邀请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举行高层次、小范围的谈心活动，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自由交谈、沟通思想、征求意见。三是 by 中共中央召开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通报或交流重要情况，传达重要文件，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政策性建议或讨论某些专题。这种会议大体每两月举行一次，重大事件随时通报。四是除会议协商以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可就国家大政方针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的政策性建议，也可约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交谈。这些协商形式，原则上也适用于中共地方党委和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之间的协商活动。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在推动多党

合作事业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完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2015年制定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进一步将民主党派职能完善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为多党合作展现勃勃生机作出了新的制度安排。

046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解决民族问题作为其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建党初期，受苏联民族政策的影响，党主张民族自决。但随着理论上的成熟和对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党逐步放弃了民族自决的理论，提出了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1945年10月23日，党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①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是我们党领导建立的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民族自治地方。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和重要政治制度之一，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②为了使民族区域自治依法有序实施，195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7-768页。

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作了具体的规划。1954年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有了正确的思想引领和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践中取得丰硕成果。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加上之前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至此，我国五大民族自治区全部成立。

改革开放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1984年5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法律，也是第一次从国家基本法的高度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并表述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三大形式。2001年2月28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尊重历史、合乎国情、顺应民心的正确抉择。从历史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基础。从现实看，长期以来由于各民族频繁迁徙，逐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和交错居住的状态，这是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然条件。从理论渊源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政权建设的总原则以及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民族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民族事务治理领域的显著优势所在。经过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努力，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医疗卫生事业持续进步。在 2014 年 9 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采取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新办法，既保证了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①在 2021 年 8 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强调，新时代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②。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民族工作做得是最成功的，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增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更加稳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1 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 年 8 月 29 日。

047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顾名思义，就是文化水平较高、知识比较丰富的人，其中不少是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行家专家。知识分子对知识、对技术掌握得比较多，对自然、对社会了解得比较深，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①在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中，广大知识分子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伟大功勋。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对革命就发挥过积极作用。“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②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里指出：“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③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全党必须密切关注的

① 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重大问题郑重地提了出来。1951年9月，周恩来向参加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的3000余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阐明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随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包括各界知识分子参加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1956年1月14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党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的正确估计和判断，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也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指示》提出，党有必要进一步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党和国家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

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知识分子又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个“金箍”不去，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很难充分调动起来。1961年，我们党制定和实行了科学、教育条例，起草了文艺条例，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重新作出科学判断，逐步端正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再次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62年2月至3月，在广州同时举行了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这两个会议为从总体上重新判断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提供了契机。2月下旬，周恩来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专程到广州同这两个会议的代表见面，进一步听取汇报，并肯定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知识分子。3月2日，周恩来对这两个会议的代表发表了

《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从实质上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党对我国知识分子阶级状况所作的基本估计。3月27日，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郑重地向全国人民重申：“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①这是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意见。

周恩来1951年《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62年《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集中反映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但是，党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观点未能得到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内受到少数人的反对，这也是后来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文化教育政策方面再次出现反复的一个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称为“老九”，受到不公正待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再次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②通过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极大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今，广大爱国的知识分子正承担着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活跃在各条工作战线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着更大作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048

十大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成了我们党面临的现实问题。对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探索。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引起我们党的反思。毛泽东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①这成为我们探索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契机。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标志着我们党开始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十大关系具体是指：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其中，前五大关系主要是经济问题，后五大关系主要是政治问题。

对于第一个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①。

对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②

在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③

在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页。

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①

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②

在对待“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③

在对待“党和非党”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④

在对待“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21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7、21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在对待“是非”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①“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②

在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③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一定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从理论逻辑看，《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这十个关系，出发点都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从实践逻辑看，《论十大关系》成为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22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页。

049

“双百”方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科学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但受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影响，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能正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学术观点问题，错误地将一些文化、艺术乃至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采取贴标签、扣帽子、打棍子等方式加以处理。这就在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不良影响，也阻碍了科学文化建设的推进。

1951年3月，在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研究院扩建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时，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写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当时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领导同志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又讲了“百家争鸣”四个字。

随着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逐步成为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

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①这是“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第一次并列放在一起。5月2日，在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双百”方针：“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們也需要这个。”^②这标志着“双百”方针正式成为我们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重要指导方针。

在毛泽东看来，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相斗争的过程中而存在和发展的，只有采取讨论、批评、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双百”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1957年2月27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双百”方针，并强调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③这个讲话就为如何更好地坚持“双百”方针指明了前进方向，作出了科学部署，也为我们党在探索中逐步走出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道路提供了行动指南。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不仅继续坚持“双百”方针，而且还提出了指导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的“二为”方向。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①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统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指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①

“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不仅合乎科学文化发展规律，而且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深受广大科学文化界人士的欢迎，也在全社会得到广泛认同。高举“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旗帜，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就斐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

050

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全党智慧，体现全党共同意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举。

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被确立下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早在建党期间，围绕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就曾发生过分歧。1921年2月，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的章程，拟采取中央集权制。上海的李汉俊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而中央只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据党的一大代表李达回忆：“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①最终，陈独秀的意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党内的这一场争论也被平息下来。这对于维护党内团结，提升党的战斗力，有极大帮助。

作为党的早期杰出代表，蔡和森对党内不太重视集中制的人提出

^① 参见李涛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了批评意见，极其强调集中和纪律严明。1920年9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①。1921年年底，蔡和森学成回国。时值中国共产党筹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党的内部却发生了李汉俊、何孟雄等人反对集中制、反对党的纪律的情况。蔡和森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及时批评了李汉俊等违反组织纪律的消极行为，指出李汉俊等把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与独裁、专制等同起来，显然是不正确的。

将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正式写入党章，是在党的六大上。1928年7月，党的六大党章规定：“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确立了秘密条件下党的活动的两大原则：一是党不能因为从公开走向地下而放弃党内民主；二是党内民主不能走向极端民主主义。为此，党的六大修改的新党章首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三条根本原则：“（1）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之。（2）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3）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管辖某一区域的组织，对该区域的各部分的组织为上级机关。党员对党内某个问题，只有在相当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2页。



关对此问题的决议未通过以前可以举行争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的执行，即或某一部分的党员或几个地方组织不同意于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的执行。”^①

经过长期的探索，1945年党的七大修改党章时，对民主集中制作了进一步概括：“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②“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③。对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党章明确规定：“（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三）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四）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④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领导制度就贯彻到国家制度建设之中，民主集中制也就成了党领导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原来“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8-539页。

主的集中制”正式修改为“民主集中制”，并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①，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完整性。同时，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还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增修到6项，增写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在地方范围内是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②等内容。这些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原则。

作为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既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能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党的百年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党的决策就会科学，党的事业就会攻坚克难屡创奇迹；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没坚持好，党的决策就会失误，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陷入困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开展党内生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页。

051

社会主要矛盾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很多矛盾，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有一个。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的那样：“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①。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公有制在我国已占据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基本解决。这时，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社会矛盾，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问题。

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汲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经过广泛调研，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判断：“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状况之间的矛盾。”^①这一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立政治路线的基本依据。而由这个主要矛盾所决定，党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但此后一个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党的八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没有坚持下来，阶级斗争被当作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重回正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②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我们党一直坚持这一论述，并始终致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生产力有了历史性飞跃，从2010年开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如今，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进出口和服务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这说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表述已经不符合实际。同时，人民生活在总体达到小康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不仅有对更多更好物质文化的需要，还产生更高更广泛的需求。与此相比较，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凸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

显出来。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这一判断与过去相比，既有重大变化，又保持了连续性，反映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发展的水平、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052

人民内部矛盾

1956年党的八大后，在国内，随着社会阶级关系的急剧变革和经济建设工作中出现的冒进现象，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呈现出紧张状态，加之少数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也引起部分群众不满。这年秋冬，许多城市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一些农村也发生农民闹退社的风波，社会上有些人因此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公开批评，发表过激言论，甚至出现一些错误议论。而在国际上，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揭露，以及随后爆发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冲击，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了出来。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个重大课题，反复地进行思考和研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

在1957年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经修改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在6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普遍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

的矛盾，而且正是这些基本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两类最具有本质特征和影响全局的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其中，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能采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即是说，解决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运用国家机器对于那些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和严重犯罪分子依法治罪，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毛泽东还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方法，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这样一个公式，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也就是我们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并一贯坚持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中，首次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指出：“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①也就是说，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除了要给予相应的惩处之外，同时，还要加强对他们的关心关爱，做好“治病救人”的后半篇文章。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页。

实行这一方针，既能够弄清思想，又能够团结同志，从而使党的建设更加兴旺发达。

同时，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可以互相转化。也就是说，人民内部矛盾在一般情况下不是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反之，有些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又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一方面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①。因此，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使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它们内部的矛盾。这样，就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就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根本着眼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点，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全党的注意力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并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高度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053

“反右倾”运动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以后，党从良好愿望出发，力图探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由于经验不足，急于求成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遭到重大挫折。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国内主要矛盾问题上提出了与党的八大相反的论断，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①这就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还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②的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以及“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③等口号。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25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对于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着促进作用。但这条总路线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它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过于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影响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民经济计划、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商业工作、教育方针及其他问题。会后，为了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全国城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同时，会议还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全国农村又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只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一亿二千多万户，已经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①很多地方甚至不顾实际，宣布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泛滥开来。

进入1958年秋冬之间，“左”倾错误带来的问题充分暴露，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并开始领导全党着手纠正错误。经过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0页。

年多时间的努力，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为了更好地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具体政策，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扩大会议以及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讨论后，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人分别发言，明确表示同意和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从7月23日起，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指责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此后，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2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①。这个精神迅速传达到全党，把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推向了全党，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反右倾”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1页。



路过程中发生的一次重大错误。在政治上，它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 300 多万人；在理论上，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发展，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在经济上，它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又掀起继续“大跃进”的高潮，使经济建设不进反退。

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①这是我们党对这段历史的清醒认识和公正结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9 页。

054

中苏论战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政治报告，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二十大的态度，《人民日报》于4月5日、12月29日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对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作了辩证分析，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给予了积极评价，并第一次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同时强调要注意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这两篇文章均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章的一些观点与苏共有着分歧，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独特意见，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后，为了改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关系，赫鲁晓夫在国际关系上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以及“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三和”“三无”理论。此后，苏联的内外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在世界范围内提倡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三无世界；在国内强调“全民党”“全民国家”。而毛泽东及

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及苏共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执行了一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造成了整个国际共运的思想混乱。

为了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思潮，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列宁主义万岁》3篇长文，否定苏共在世界形势、列宁主义是否过时、马列的革命学说、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帝国主义、革命斗争与议会斗争等相关问题上的理论观点。两个月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向中共代表团提交了一封信，全面驳斥了中共在上述3篇文章中的观点。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此后，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以及苏共影响、控制下的一些共产党发表许多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答复和反驳受苏共影响而对中共加以指责的一些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连续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7篇文章。这7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出苏共领导人，对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有相当的限制，但中苏论战已就此开场。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特别提出了苏共拟定的“三和”“两全”“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中共中央收到来信后，决定发动对苏共中央的全面批判。4月4日，《人民日报》将苏共这封来信发表出来，从此两党之间的争端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化了。6月14日，中共中央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为题复信苏共中央，作出强硬反击，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只能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①这就使两党之间的论战进入了新的高潮。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的复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攻击，并且在国内各大报刊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为了说明真相，辨明是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陆续发表了苏共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章、讲话和决议。此后，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世界历史教训。原先还准备的第10篇评论，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而没有发表。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论战画上了句号。

中苏论战是中苏关系史和国际共运史上一个十分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这场论战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页。



阵营的破裂和中苏关系的破裂。客观分析，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联挑起的，中国共产党反对苏共大党、大国沙文主义也是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但正如中苏论战当事人之一邓小平所说：“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①邓小平还强调：“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②这就彻底否定了以“论战”形式解决党际间分歧的正当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提出“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始实施的“工业化”建设，其目标也是希望能把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②。9月23日，周恩来在这次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③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

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其内涵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充实。毛泽东在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0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3页。

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指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①。这时不再把交通运输业单列为现代化的一项内容，而是将其作为工业的组成部分。同时，把科学文化和工业、农业并提，使现代化的内容更丰富。1959年年末至1960年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议在现代化的内容里重新加上国防现代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②这就第一次完整清晰地表达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

在1963年1月29日召开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③这就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并同时说明了“四个现代化”的各个部分是同时并进、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不能搞单打一，特别是在进行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同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1965年1月4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根据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①同时，周恩来还明确提出20世纪内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会决议批准了周恩来所作的报告，从此，“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也成为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宏伟目标。

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②这样，“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口号就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成为鼓舞我国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基础和精神动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2页。



第三部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056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后，党中央迅速粉碎“四人帮”的阴谋，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然而，“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其“左”的思维惯性却依然存在。1977 年 2 月 7 日，当时的三大党报党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刊发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份社论的核心思想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①

这种对权威不加分辨的态度本身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因此，这篇社论一发表，就受到了质疑。1977 年 4 月 10 日，邓小平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就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②邓小平这里提到“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自然不包括“两个凡是”。

1977 年 7 月，当时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胡福明应《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邀约，开始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准备从

①《学好文件抓住纲》，载《人民日报》1977 年 2 月 7 日。

②《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9 页。

理论角度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加以驳斥。9月前后，胡福明完成了他的文章，寄给《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理论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稿件进行反复修改，准备于1978年4月在哲学专刊上发表。在审阅稿件的过程中，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敏锐地察觉到这篇文章的分量，决定从哲学专刊上撤下稿件，并邀请中央党校的专家参与审稿，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

与此同时，1977年12月，为落实中央关于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历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的指示，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提出实践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问题。1978年4月，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的吴江受邀参加《光明日报》理论部审稿过程中，将胡福明的文章拿给胡耀邦审阅，并提议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胡耀邦同意了 this 提议，并把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上刊发；11日，《光明日报》头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进行转载，新华社也作了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相继转载；其后，全国各大报刊也纷纷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运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呼吁让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重新回归到实事求是的道路上来。但在当时，理论上的较量不可能随着一篇文章的发表就尘埃落定。当全国主要报刊陆续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争议也随之而来。于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然而，真理的力量是巨大的，是任何其他力量都压制不住的。



1978年6月，时任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就真理标准问题在军内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强调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①进入8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发生变化。以8月4日《人民日报》公开报道黑龙江省委表态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全国各省纷纷表态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不赞成“两个凡是”的提法。这场大讨论以坚持实事求是的一方胜利而告终。最终，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理论武器，提出重新审议“文化大革命”历史错误的问题，并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深刻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肯定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取得的成果：“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②

真理标准大讨论超越了一般哲学问题的争论，是党在思想上、理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谈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重大意义时，邓小平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①这场大讨论冲破了“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打破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标志着党在理论探索上重新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拉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大剧的序幕。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057

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各条战线努力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力图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以消除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秩序。如，1977年5月，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针对当时我国科学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谬论的批驳，为当时教育科技界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

1977年7月16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部恢复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在会上，邓小平作了复出后的第一次正式讲话，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完整准确的认识，有效地抵制了“两个凡是”的影响。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的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展开，其中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同时，还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恢复和发展了被中断的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党政、教育、科技、体育等各行业都进行了拨乱反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彻查和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行。1981年3月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情况报告》，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一步迈向健康发展轨道。

二是平反“文化大革命”及1977年、1978年发生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为大批无辜人士恢复名誉。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主持撰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呼吁各级组织部门要敢于冲破阻力，纠正被颠倒的干部路线。10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全部错了全部纠。这两篇文章表达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呼声，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舆论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让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回党中央领导岗位。

三是全面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受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影响而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系统清理了重大历史是非，肯定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错误文件等。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1977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全国约有570多万知识青年参加了高考，其

中 27.3 万人被录取。^①社会上开始重新出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各学校的教学工作也开始陆续走上正轨，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批人才又开始得到有计划的培养。1977 年 9 月 18 日，中央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恢复了科研工作的领导机构，抓紧科研队伍建设，恢复相关研究机构。

1979 年 11 月到 1981 年 6 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组织开展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这一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总结和评价，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拨乱反正工作调整了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大力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为我国实现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基础。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 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15 页。

058

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也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有步骤地妥善处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好各方面社会关系，是加强安定团结、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条件。

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呼吁尽快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冤假错案平反。但是，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却继续坚持“左”的错误思想，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导致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谈到“两个凡是”错误思想时，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①。这就为全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在政治上指明了方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1977 年 12 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平反工作。这是我们党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在组织上所做的保障。中央组织部和各级党组织发动几十万干部和广大群众，集中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很快打开了平反工作的新局面。

1978 年 2 月到 4 月间，中央组织部先后分六批同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22 个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主管干部工作的负责人召开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讨论案件近 200 件。^①一大批长期受迫害被关押或被下放劳动的老同志，陆续被解除监禁或接回北京治病，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开始重新进行复查。特别是以“薄一波等 61 人叛徒集团”案的复查为突破口，推动了整个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4 月上旬，文化部党组召开万人大会，宣布为受“四人帮”迫害的人民艺术家老舍等一批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但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而且开启了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新局面。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曾经发出的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为这两个错案和“二月逆流”正式平反。同时，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这标志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面铺开。其后，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使受到这一冤案错案牵连的近 3 万人得以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 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11 页。

昭雪。^①这一“文化大革命”中最大冤案的平反，推动了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进程。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82年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在此期间全国共纠正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②他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或担任新的职务。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群众，由此得到解脱；曾经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也得到了昭雪。这既增强了党的团结，有效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也对促进社会安定团结、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669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669页。



059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国从 1958 年下半年起在广大农村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由于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先前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积极的地方，多数成为重灾区。1961 年年末，一些饥荒最严重的地方开始悄悄走“回头路”。他们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为包产到户、责任田，恢复农村自由集市。包产到户的形式十分有效，粮食大幅增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是，怎样看待这种生产形式，党内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这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否定，是刮“单干风”，是复辟和倒退。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62 年 7 月 2 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如何恢复农业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现在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①7 月 7 日，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邓小平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13 页。

又对此作了阐发，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①。邓小平的这两次讲话，不久即因毛泽东批评“搞单干风”收回。而此后长期实行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不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所以当时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都比较缓慢。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签下大包干“生死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大包干的实质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就打破了“大锅饭”，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了有统有分、统分结合。实现大包干之前的小岗村，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而实现“大包干”的第二年，小岗村就获得大丰收，村民不但吃饱了肚子，还给国家和集体上缴了粮食，一举结束了长期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

在得知小岗村包产到户获得丰收的情况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亲自前往考察。经过考察，万里决定在安徽全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制度。当时的中央负责人也决定在安徽试点，并且允许安徽“看三年”，用事实说话。1982年1月1日，党中央以一号文件形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式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①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解释：“近几年在农村建立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只能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决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轻率变动，更不能走回头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必然会提出新的各种联合经营的要求。”^②

1983年、1984年，党中央又连续下发一号文件，把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到了全国农村。由于经济效益显著、致富方式直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被广大农民群众接受了。到1984年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实施，充分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1984年，全国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393公斤，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2016年4月，习近平在安徽调研期间，专程赶到凤阳县小岗村实地考察。在18户农民发起大包干签字的“当年农家”院落，习近平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赞小岗村当年的创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叮嘱要好好记住这段历史。在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习近平强调：“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在小岗村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们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①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党领导广大农民在探索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过程中，又创造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模式，探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经营制度。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再到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都充分调动了亿万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切实拥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

^①《习近平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 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民安居乐业》，载《人民日报》2016年4月29日。

060

小康社会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诗经·大雅·民劳》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百姓劳作实在太辛劳，也该稍事休养生息了。后来，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将“小康”视作一种虽不及“大同”，但仍然比较理想的社会。从此，“小康”就成了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寄托着千百年来人们对安定幸福生活的恒久守望。因而，“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①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借用极富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小康”一词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小康”以崭新的时代内涵。1979年12月，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②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三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

①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从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小康就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20世纪末，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胜利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然而，当时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为了巩固和提高小康水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①，正式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又更进一步地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要“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②。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③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



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在总量和速度上完成目标，更要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上取得新进展。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全面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 14 亿中国人民共享全面小康的成果。全面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全覆盖的小康，一个地区也不能少，对于农村地区、革命老区、边远地区，更是不能忽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取得新的重大进展。随着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日益迫近，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①。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2 页。

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① 在中国这样一个 14 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既表明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蕴藏的伟大力量。当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仅仅是一个分号，而不是句号，中华民族更加精彩的诗篇还在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有信心到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华民族以更加美好的姿态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 页。

061

党内政治生活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使用“党内政治生活”一词的是列宁。1915年5月，列宁发表《空泛的国际主义的破产》一文，在批评有人“对俄国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①时，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该文所说的“俄国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实际上就是列宁提出并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自创立之日起，就规定了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注重通过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党员党性、提高党员思想觉悟。在党内，率先使用“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概念的是蔡和森。1926年年初，蔡和森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的报告，其中就讲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党内政治生活”的状况。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要“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②，正式把这一概念应

①《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用于党的建设要求。以此为标志，古田会议成为我们党开展严格认真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源头。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我们党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党员和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①

我们党首次在党内法规文件中使用“党内政治生活”这一科学概念，是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认真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②。

2012年11月16日，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二天，习近平即发表署名文章《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指出“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规定，敢于坚持原则，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弘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③。此后，习近平又反复强调要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③ 习近平：《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0日。



“严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2016年6月28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抓好了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重要基础。全党同志都要行动起来，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出贡献。”^①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总结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并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理论和实践加以创新，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准则》和《条例》都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文件。《准则》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等12个方面共160多条规定，对党章有关规定和要求作了系统化、具体化阐释。

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也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和干部作风。实践证明，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载《人民日报》2016年6月30日。

党员领导干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关键在于加强政治训练、政治历练，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站位、锤炼政治能力、强化政治担当，切实使党内政治生活风清气正，让党内政治生态山清水秀。

062

思想路线

党的思想路线也叫认识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所遵循的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未能真正贯彻，国家建设受到严重挫折。“四人帮”被粉碎后，“两个凡是”又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社会各方面建设的恢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解放思想、冲破这个禁锢显得格外重要。邓小平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为此，全国掀起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确指出：“要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学风”。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1978年4月，《光明日报》编辑部拟将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撰写、由编辑部审核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发表在哲学专刊上。后来，为了增强现实针对性，《光明日报》负责人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帮助修改，准备作为重要文章在头版发表。文章在修改过程中将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由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审阅定稿。5月10日，文章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5月11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5月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从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全面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①最终，全党认识统一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上。这场以理论界为主、新闻界积极推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大讨论，最终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党的思想路线完整表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①此后，党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实践环境和具体任务，针对在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方面，其目的和归宿都是真正彻底地做到实事求是。正是因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和核心是实事求是，所以我们通常把党的思想路线简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制定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正如邓小平强调的那样，“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②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一切胜利，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而制定并贯彻了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063

时代主题

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主要矛盾，都有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这个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就是这个时代的主题。20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世界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促进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觉醒，使社会主义革命风起云涌，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所以，“战争与革命”便是那个时期的时代主题。20 世纪下半叶，世界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第三世界力量的壮大，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总趋势。面对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1985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访华团时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①。“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②。在论述和平问题时，邓小平说：“虽

①《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4 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5 页。



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①。“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②。“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③。“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④。同时，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相互交织、密不可分。一方面，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另一方面，各国的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长久和平的基础。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被党的十三大概括为“时代主题”。这一时代主题的确定，对于我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深远意义。首先，有利于我们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利用难得的和平时期，一心一意谋发展。其次，使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特点更加鲜明，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谁。”^①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从十个方面阐述了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作了归纳和总结，表明我国基本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再次，使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发生转变。1985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部队从以前立足于备战的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走精兵之路。1985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作出裁军100万的决定，明确要逐步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强的精兵。^②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并未过时。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时指出：“环顾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③，“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④。在这一时代主题下，我们党正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758页。

③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

064

基本路线

基本路线是相对于具体路线而言的根本指导路线，是我们党在一定时期的行动纲领，用以指导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制定了不同的基本路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把“工农联盟”作为我们的一个基本路线。1933年8月，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在革命战争激烈发展的情形下，进行各项经济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否则敌人的封锁，奸商和反动派的破坏，会使工农生活受到影响，“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①

后来，我们党更多地用“总路线”一词来表达一定时期的行动纲领。比如土改运动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总路线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在这一总路线指导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我们党又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密结合，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我们党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②。这一总路线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由于这条总路线是在批评反冒进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存在严重缺陷，即片面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

调经济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和实事求是原则。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①其后，党的十七大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写入了基本路线。党的十九大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不仅将“美丽”纳入了基本路线，而且将“现代化国家”提升为“现代化强国”。

党的这一基本路线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基本途径和根本保证、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方针，既抓住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又体现了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规律全面推动历史进步，实现国富民强、民族振兴的要求。习近平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②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风险和挑战，只要守住这条生命线，中国人民就一定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065

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给当代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生机和活力。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国仍存在“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等政治体制上的问题，干部制度中也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等现象，严重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我们党提出必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8 年 12 月，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人民民主，健全国家法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①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1986 年 11 月 9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表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有三个：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06 页。

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①1997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②党的十五大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期过程中，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展开的。党的十五大指出，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五大体制改革要点，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③这就为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18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页。

在新时代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明确了方向和重点。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作出的重要决策。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较好地解决了束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利因素，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①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8 页。



066

治理整顿

我国改革开放起步后，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但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不协调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等情况，引起群众不安。这些问题有的是多年积累下来、短期不能完全解决的，也有的是改革开放过程之中形成的。对此，需要党和政府拿出有效办法，尽快加以解决。

1985年年初，我们党决定采用“软着陆”的方针，也就是用比较缓和的办法，逐步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恢复平衡。当年2月到10月，国务院先后召开四次省长会议，想通过紧缩银根、控制货币投放等方法解决消费基金增长过猛、信贷规模过大、外汇使用过多等问题，但是，并未达到预期效果。^①

在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之下，1988年夏天，我国全面推行价格改革，放开价格管制。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准备用5年左右的时间，解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749页。

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尽管这个方案没有正式实施，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该方案的消息公布后，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本来已经非常严重的高通胀预期，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的风潮，使物价问题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我们党在1988年9月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①的方针，决定后两年的工作以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为重点，强调改革必须是全面配套的改革。其中，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主要是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混乱现象，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各种乱象，制止一切违反国家规定哄抬物价行为，实行政企分开，惩治“官倒”，制止各方面对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是进行全面的配套的改革，在改革中特别需要注意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并开始逐步取消“价格双轨制”。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是符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客观要求的正确决策。为贯彻全会精神，1988年10月，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关于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等指导性文件。1989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的政府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



作报告。

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控制，相当多的商品由原来供不应求开始转为供大于求，但一些深层次的结构和体制问题还没有解决。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确定在前段时间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再用3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要求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认真整顿经济秩序，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并切实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领导。我们党明确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改善产业结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改革措施。^①治理整顿大体分两步：第一步是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以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为侧重点；第二步是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又经过几年的努力，治理整顿取得了较好效果，过热的经济明显降温，国民经济保持一定增长速度，供求平衡矛盾明显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产业结构调整开始起步，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缓解，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涨幅从1988年的18.5%回落到1991年的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781页。

2.9%。^①由此，市场秩序明显好转，居民消费心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七五”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到1990年年底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根据这种情况，1992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以治理整顿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可以如期结束。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781页。

067

资产阶级自由化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全面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在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先进经验的同时，西方的一些错误思潮也趁机渗入。一些人由于政治立场不坚定、认识水平不足，受到这些错误思潮影响，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感到迷茫；也有一些人出于别有用心目的，借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攻击党和政府。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要求实行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其实质就是否认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这股思潮，并强调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倾向。1985 年 5 月，邓小平在同一些学者谈话时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①9 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邓小平又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

^①《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3 页。

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①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②

然而，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却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鼓动不明真相的学生走上街头，参加游行，扰乱社会治安，其危害远远超出了思想文化的范围，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在中央举行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制造谣言，蛊惑群众示威游行、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并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于6月4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总结这场政治风波的教训，邓小平认为，之所以出现政治风波，从国际大气候看，是因为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和社会思潮的煽动；从国内小气候看，是因为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求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因此，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我们党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更加警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和立场也更加坚决。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18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分条例》，明确规定：“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就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体化为党的纪律。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贯穿于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是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仍在不断向我国渗透，境内外的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对中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批评、否定和污蔑。对此，习近平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①。我们一定要站稳立场，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思潮，自觉主动地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以确保改革的方向和国家政权的稳固。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历史记录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盛衰兴亡，是其根脉所系、魂魄所在。因此，尊重历史、牢记历史、以史资政，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自近代就传入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趁机抬头，还一度甚嚣尘上。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其鼓吹“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解释”，实质上就是秉持虚无主义历史观来认识、分析和解释历史现象。在当前我国，一些人大肆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并非单纯地把它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和现实指向。他们打着“还原历史、还原真相”的旗号，伪造、篡改、歪曲、恶搞历史，或者是将历史碎片化、片面化，大肆否定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优秀传统文化，否定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道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胡说“党的历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和堆积”，宣扬“中国应该以英美为师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根本上说，其用意就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此，习近平深刻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



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①

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在理论上十分荒谬，而且在现实中危害极大。30年前，苏联之所以解体，苏共之所以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搞了历史虚无主义，把苏联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结果党组织无法发挥作用，军队也脱离了党的领导，最终导致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因此，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之间的斗争，并非单纯的学术之争和理论之辩，而是一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与反“颜色革命”、颠覆与反颠覆的意识形态之争和政治斗争。斗争的胜负，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决定着中国今后将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前进。对此，我们必须始终头脑清醒，要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不能任由历史虚无主义侵蚀我们的历史根基。

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是唯心史观，主张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有一个死穴，就是不尊重历史事实。对此，习近平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②“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5页。

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①

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进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态度必须特别鲜明，决不能含糊其词，更不能退避三舍，必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规律性、全面性原则，根除历史虚无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要维护正史信史的严肃性、权威性，主动发声、占领阵地，旗帜鲜明地批驳、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诞言论，形成“以正压邪”的良好舆情生态。要创新党史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丰富网络平台和网络话语体系，增强党史教育的科学性与实效性。总之，“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历史定力，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②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4-25 页。

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9 页。

06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这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定论。受这一模式影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对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优长有了越来越多的直观感受，也产生了越来越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认识。

1979年3月，陈云在我们党内创造性地提出了“市场调节”的新概念，并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当然，重视市场调节，并不排斥计划的宏观调控，而是要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同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也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①这番话突破了对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刻板认识，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并没有被人们所广泛接受。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1981年12月，陈云又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新构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召开，“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被写进了大会的政治报告。之后，在对这一思想进行解释时，陈云进一步用“鸟”和“笼子”的关系来阐述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他说：“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①陈云“鸟”与“笼子”的比喻旨在强调，计划与市场都是搞活经济的手段，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既要引入市场机制搞活经济，又要防止“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1982年宪法确认了这个提法，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②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明确规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

^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①。之后，党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继续深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②。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地讲：“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③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④

党的十四大之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原则。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从八个方面作了任务部署。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建立到不断完善、成熟,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的生机活力,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奇迹。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②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形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体制保证。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强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政府监管效能 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载《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8日。

070

所有制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家庭关系、宗教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都受生产关系的支配和制约。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最基本的，也是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生产、分配、交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前提决定的。同时，所有制也是区分不同生产方式、判定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客观依据。历史上，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性质，区分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这两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是并存的。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必将取代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我国的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剥削制度，全面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使当时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鉴于当时的国情，需要率先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

经济工作。对此，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经济问题，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指出“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①。这就开启了对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此后，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江泽民强调要“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果失去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③。此后，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家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给予正确引导、加强监督、依法管理，以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从总体上看，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1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体现在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体现在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

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①。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②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从总体上看，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才能防止两极分化，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体现效率原则、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稳定，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8-19 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7-18 页。

071

战略思维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战略问题和战略思维，总是能够站在战略的高度谋划党和国家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党的十六大提出，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都要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②。这就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五个思维的要求，并把坚持战略思维放在了首位。

所谓战略思维，是指主体对关系事物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谋划、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强调从全局、长远、根本上把握各种本质关系，并制定解决问题的战略目标。战略思维包含三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目标定位，这是战略的根本要义所在。战略本身就是指向未来的，它要解决的是行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3页。



者要“到哪里去”这个根本问题。第二个环节是现状定位。所谓现状定位，最主要的是要明白“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我是谁”，这是战略制定的逻辑起点，主要表现为时空两大范畴。就时间而言，主要体现为发展的定位，这就是一个历时性问题。就空间而言，主要包括区域位置、地理条件、人口结构等因素。第三个环节是战略措施。现状定位与目标定位之间存在差距，如何缩小这段差距，战略措施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怎么办”的难题，主要包括实施途径和手段。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能否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能否做好工作，战略思维也至关重要，它是领导干部的核心能力。对此，习近平指出：“全党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①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还特别强调，全党都要学习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②。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切实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和其他本领和能力一样，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掌握科学方法，经过长期训练和实践逐步形成。一是要在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理论学习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刻苦钻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全面掌握科学的方法论，不断涵养积累战略思维底蕴。二是要在勤于思考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面对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势和各类难题，要有意识地从战略高度判断形势、处理问题，不断增强纵览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的能力。三是要在实践探索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通过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清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哪里，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实现科学决策和正确领导，不断提高战略思维素养。四是要在总结经验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经验教训是财富，关键要认真总结。要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积极思考，深化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提高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领导 14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面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只有不断培育战略思维，准确把握机遇、有效应对挑战、科学破解难题，才能牵住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牛鼻子”，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



072

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努力。党的十六大之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发，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胡锦涛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②。这个重大判断，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并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3页。

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定位、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等，并将“和谐”列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决定》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的主要原则，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写入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此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2017年，党的十九大又把“美丽”纳入社会主义初级基本路线，明确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意味着，我们所追逐的现代化强国将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和谐的强国。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当前，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同时，世界又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



问题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对此，我们党把和谐理念运用到更广阔的领域，提出构建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美好的目标。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胡锦涛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利益关切。2015年3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中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9月，他在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时，再次传递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在价值追求与政治逻辑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我国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也必将为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增添新的动力。

073

社会主义新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习近平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①。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包括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产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诸多方面。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这“五个统筹”。其中，统筹城乡发展就是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明确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管理民主”的要求，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从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等五个方面进行。

200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颁布，标志着我国明确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到农村。2007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强调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科学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一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主要是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二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主要是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三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主要是保障农民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

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①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依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必须要补齐的短板。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要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要求，抓紧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让亿万农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①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1-82页。

07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别是意识形态建设的认识。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我们党都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调决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我们党一直强调要在全体人民中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我们党提出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此同时，汲取我国传统荣辱观的精华，我们党又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顺应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要求，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基本内容。”^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灵魂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精髓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基础是社会主义荣辱观。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②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③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明确要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①。

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是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未来发展中还会存在各种风险。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同时，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加速期，社会思想意识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将进一步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从而能够把千千万万为创造美好未来奋斗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使我们在突发事件来临时从容面对、自信迎战。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能够大大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有利于保持中华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先进性，有利于抵御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抓住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和根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彰显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为我们在新征程上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指明了方向。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8 页。

075

文化软实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的繁荣兴盛，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来看，既包括经济产值、科技水平、军事装备等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并可以量化的“物质硬实力”，也包括精神、情感、智慧、情操、品格等一切看不见、摸不着、难以计量但却可以发挥柔性亲和作用的“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它虽然是一种无形的、难以量化的、非强制性的力量，但却可以通过文化的吸引力、语言的说服力、理想的感召力、精神的鼓舞力、智慧的创造力、道德的感染力、理论的指导力、舆论的引导力、艺术的感染征服力等，发挥吸引、凝聚、感召、动员、说服、诱导、感染、共鸣、同化等影响人心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我们党进行了不懈探索。邓小平提出，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全面推进的社会主



义。”^①进入 21 世纪，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我们党顺应形势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大会还作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决定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工程。胡锦涛指出：“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②。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要求，并将“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写进了大会报告。2011 年 10 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对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了全面部署，成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在党的十八大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还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

①《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5 页。

②《胡锦涛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38 页。

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文化是软实力，增强文化软实力却是硬任务。提高文化软实力，一是要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弘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大力推进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二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解释好中国特色，注重国家形象塑造，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三是要加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提炼与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和传播渠道，使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提高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知晓率和认同度，实现文化软实力提升“形于中”“发于外”。

中华民族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第四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076

中国梦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①这一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论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指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升华了我们党的治国方略，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

中国梦贯通历史，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中华民族拥有 5000 多年的历史，为人类文明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来，由于闭关锁国，中国开始落后于时代，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历经磨难，受尽屈辱，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正如习近平所说，每个中国人想起那段历史都会感到心痛。由此，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就有了一股民族复兴的心结和劲头，而且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地为之奋斗。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提出实现中国梦，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的责任担当。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6 页。

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与人民梦的有机统一，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习近平指出：“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①这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其中，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前提，人民幸福是落脚点。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心中都有一个梦，都有追求幸福生活、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习近平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②。实现中国梦，就是实现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就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也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愿意为实现这个梦而付出，并通过集体的奋斗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发愤图强的复兴之梦，也是与世界人民携手并进的共赢之梦。梦想是人类共同追求，世界各国的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是相通的。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世界好，中国同样会更好。中国梦，把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把发展自己与促进人类文明崇高事业统一起来，必将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为人类文明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2013年3月，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政治前提。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充分证明这条路方向正确，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下去。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中华民族以民族精神为纽带，始终坚强地团结在一起，使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以时代精神为依托，不断解放思想、兴利除弊，使中华民族得以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将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国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源泉。只有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积极回应人民期待，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心共筑中国梦。

今日之中国，已经展现出民族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更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②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就一定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2 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7 页。

077

伟大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党，认识并运用社会矛盾规律，坚持斗争、不懈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前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中华民族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能从生灵涂炭、饿殍遍地的黑暗深渊迈入生活小康、幸福光明的美好天地，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带领人民百折不挠开展斗争，跨越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于《〈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我们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①后来在1962年，毛泽东又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到工农武装割据，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604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无一不是伟大斗争。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直气壮讲斗争，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个领域强调斗争的重要性。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②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③。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各种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13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坏活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言行，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在伟大斗争中开拓社会主义道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①。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人民，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必须坚守为了人民的根本立场，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坚决同脱离群众、漠视群众权益、侵害群众利益的思想 and 行为作斗争，努力让群众放心、满意、幸福。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必须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壮士断腕、凤凰涅槃的决心，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同一切因循守旧、故步自封、顽固保守、不思进取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①。当前，我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安全和发展利益面临严峻挑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形势错综复杂，还有各种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加紧活动，必须与之长期斗争、坚决斗争，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②。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然带来多方面的风险，无论是外部风险还是内部风险，无论是重大风险还是一般风险，都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我们要善于从平静中预见危机，从机遇中看到挑战，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仗。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建党 100 多年、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历史，既是与各种困难考验和风险挑战不懈斗争的历史，也是在各种斗争中锤炼钢铁意志、升华斗争精神的历程。所谓斗争精神，就是勇于亮剑、敢于碰硬、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迎来光明前景，但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①。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要求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习近平指出：“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②

斗争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在不断学习中提高。习近平在 2019 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25-226 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26 页。



上强调：“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①

筑牢斗争精神，必须强化理论武装。习近平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②我们党在历史上之所以具有顽强的韧性和不屈的品格，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在新时代，筑牢斗争精神，必须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保持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这样斗争起来才有方向、有底气、有力量。

筑牢斗争精神，必须勇于担当责任。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抛弃当“太平官”、过舒服日子的想法，做勇于斗争的“战士”，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自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事关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革命，尤其需要领导干部到斗争实践中经历一些风雨、多见一些世面。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千万不能胆怯泄气，更不能退缩当逃兵，必须担当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7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7页。

作为、迎难而上，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

筑牢斗争精神，必须提高斗争本领。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斗争精神对斗争本领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只有勇于发扬斗争精神，才能更好地、彻底地发挥斗争本领；另一方面，斗争精神又是以增强斗争本领为前提、为基本要求的，没有较强的斗争本领，就会底气不足，心中无数，不能很好地发扬斗争精神。因此，党员干部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①，到重大斗争一线去真刀真枪磨砺，补短板、强弱项，学真本领、练真功夫。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朝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②“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③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7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3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

079

担当精神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依靠担当立党、兴党、强党。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敢于担当，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展现出一往无前的伟大担当精神。可以说，担当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特质，担当精神是我们党能够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原因。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就没有中国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今天。

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需要共产党人的担当。因此，干部敢于担当作为，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习近平把忠诚干净担当作为好干部标准，强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①，“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45页。

风”^①，“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②。对于干部来说，担当是立身之本，是为政之基，也是成事之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正是得益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干部锐意改革创新、勤于干事创业、勇于担当奉献。因此，当前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是能够适应事业发展需要的。但也要看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庸政懒政怠政、改革勇气锐气弱化，不愿负责、不敢碰硬，作风漂浮、热衷搞花拳绣腿。针对一些党员干部不愿担当、不敢担当的问题，习近平指出：“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不当怕见风雨的泥菩萨”^③。201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强调，广大干部要“切实增强政治担当、历史担当、责任担当，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④。

弘扬担当精神，就是要永葆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带领人民群众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体地说，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22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23-524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22页。

④《中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18年5月21日。



就是：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习近平强调：“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①。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复杂、斗争尖锐，作为领导干部，要有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大是大非和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矛盾问题面前，最能考验领导干部的担当作为。习近平指出：“在发展上要勇于担当、奋发有为。……把握和顺应深化改革新进程，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从实际出发，带领群众一起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②。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深化改革攻坚期、社会矛盾凸显期，广大干部必须把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挺直腰杆担当，甩开膀子干事。

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领导干部敢于担当，不仅要体现在平时工作中，更要体现在紧急关头上。习近平指出：“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③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广大干部必须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争当先锋、敢拼善战，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5 页。

②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7 页。

③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4 页。

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出现失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掩饰失误、推卸责任，不能思其过、改其行。当前，由于经济转型任务日益加重、社会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干事创业难免会犯错误、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失误，敢于承担责任，及时加以改正，把纠正失误、总结教训的过程作为成长进步的阶梯。

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在各种歪风邪气面前，是做挡风驱邪的泰山石，还是做八面玲珑的老好人，成为每一名领导干部面临的现实考验。敢于担当，就要有正气压倒邪气的必胜信心、舍我其谁的政治担当和铁面无私的浩然正气，对歪风邪气理直气壮地说“不”。对于各种违纪违规违法行为以及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要敢于较真碰硬、真抓严管，决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躲避退缩。

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铸就了辉煌过去，也昭示着光明的未来。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进道路上，我们面对的风险和挑战空前严峻，攻坚克难的压力前所未有。在各种艰难险阻面前，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广大干部要不懈淬炼勇于担当的政治品格，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切实把担当精神贯彻到统揽“四个伟大”的全过程。

080

战略定力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当今时代，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国家间既有“硬实力”的直接比拼，又有“软实力”的暗中较量，更有国家战略思维、战略决策和战略能力的深度角逐。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①

就战略定力而言，它是对战略目标的自信、意志和毅力，主要指在事关根本、全局和长远的态势判断、目标确定及布局构建等战略问题上，能够排除各种干扰，保持冷静头脑，科学地认识抉择和坚定地执行实施的能力、信念和心态。对一个国家、民族、政党来说，朝令夕改、朝三暮四是不能实现战略目标的，一定要防止出现因为意志不坚定或者受外部因素干扰而半途而废的情况。只有拥有了强大的战略定力，才能够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沉着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一往无前，行稳致远。

拥有强大而持久的战略定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和优势。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严峻挑战和艰难困苦，我们党总是能够沉着冷静、从容不迫，总是能够化危为机、开创新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战略定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立时代潮头，坚定不移引领党和国家事业迎难而上，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断前进，展现了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面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根本性问题，习近平郑重宣示：“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在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也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人民利益、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这一个个“坚定不移”，反映的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的意志与决心。为了扎实推进各项具体工作，习近平还对如何保持战略定力作了许多形象化的表述，要求全党同志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等。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中，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使党和国家事业实现了新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了巨大威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①在国内转型、国际变局的新形势下，我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新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越是这样，越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战略定力。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不为各种错误观点所左右，不为各种干扰杂音所迷惑，冷静把握世界大势，理性分析中国国情，谋定而后动。我们要把握战略主动，在复杂矛盾面前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促进形势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我们要锤炼战略耐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工作方式方法上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创新性。

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风云变幻最需要的是战略意志和战略定力。唯有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以更坚定的立场、更科学的方法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以更坚决的意志、更有力的行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我们才能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坚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 页。

081

顶层设计

改革开放没有现成模式可以照搬，必须采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方法论。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条重要方法论。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①这一论述，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继承与发展，对于在新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是富有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其实质就是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一边探索、一边推进改革开放。这其中的“过河”是目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8页。

的，“石头”是条件，“摸”是措施，所蕴含的哲理就是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要不断进行尝试摸索，将实践中形成的个别经验上升到一般经验，最后到达成功的彼岸。因此，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和把握继续前进的规律性。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正是采用这种方法，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顶层设计，原本是一个用在建筑学、工程学、艺术学、经济学等领域的概念，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顶层，强调总揽和协调；另一个要素是设计，强调谋划和布局。将顶层设计赋予改革的方法论含义，就是强调要更加重视对改革的宏观思考、总体谋划、整体规划，就是要求在一定的理论、理念指导下，制定出政策、规划，从上到下层层贯彻落实。其目的在于寻求改革的总体和全面解决方案，其路径在于由上而下和整体推进改革，其关键在加强各领域各方面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

之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强调顶层设计，是因为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意义重大、成效显著，但从前期的改革来看，在一些领域和方面存在碎片化、割裂化、条块化等短期行为，由于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各领域改革中不配套不协调以及各方面改革措施间相互牵扯、相互抵触等问题长期未得到有效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在客观上要求对未来的改革进行整体谋划，提出前瞻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贯通性的改革思路和框架。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一方面，要始终坚持摸着

石头过河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对还不了解、未能把握的情况和现实，不能犯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的错误，而是必须首先进行尝试试验，然后对摸着石头过河取得的经验加以及时总结、全面把握、深刻提炼、逐步推广，从而降低改革的风险与成本。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顶层设计的全面性和决定性作用。在充分了解现实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以系统工程的方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改革，从整体上把握改革进程，并注重制度、政策的配套和衔接，防止各自为战、相互脱节、相互冲突。同时，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统一。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都是社会实践的基本方法和重要环节，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不可或缺，又不能畸轻畸重。辩证地看，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为顶层设计积累经验，探索路径；顶层设计也是边设计、边试验、边完善，让摸着石头过河的成果惠及更多、更广。

改革是一个上下互动、互为补充的过程，既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也需要顶层设计。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全面深化改革应把握的重大关系之一。时至今日，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已经大为拓展，切实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向深入，既要加强宏观思考、顶层设计，又要鼓励大胆试验、大胆探索，保证改革健康有序推进。

082

颠覆性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以各种各样的复杂心理，千百次地“预言”中国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会发生他们极其武断地预测的“变化”。而在国内，既有试图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西方“邪路”的种种思潮和认识；也有曲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困难和问题，试图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的种种思潮和认识。所有这些，在本质上都是要“改变”乃至“颠覆”当代中国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所谓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宪政民主等西方思潮更是粉墨登场，鼓吹中国应在经济制度上实行彻底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绝对自由化。它们试图影响甚至左右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动摇中国人民的信念，奢望要中国改旗易帜，把中国引向“邪路”。然而，放眼世界，这些荒谬言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是灾难性后果。拉美国家走西方大国为其设计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以来，无力扭转经济和金融危机，出现持续的经济衰退、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休克疗法”非但没有让俄罗斯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反而陷入了发展的“陷阱”不能自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①。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作出的庄严宣示，是中国人民作出的历史抉择。

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星期六新闻》节目独家专访时强调，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②所谓颠覆性错误，也就是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或者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改革开放，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认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会永远扎扎实实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不动摇，咬定青山不放松。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深刻认识新时代党面临的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14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改革开放考验，习近平反复强调：“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①。

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开放，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却不尽一致。在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总爱用审视的、质疑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而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消极腐败等却揪住不放，甚至肆意放大、无限上纲，全盘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我们党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和党的宗旨。这种观点和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不破除这种封闭僵化思想的禁锢，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子。这些错误之所以存在，就在于看问题的立场、方法不对，不是站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立场上看问题，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看问题，而是戴着教条主义的有色眼镜看问题，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固守条条框框，只见问题，不见成绩，甚至以偏概全，以局部否定全局。

另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来自右的干扰始终没有中断过。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在社会上就滋生蔓延起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种思潮借口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而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全盘否定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借助国际上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异化思想热，试图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制造“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企图搞乱我们党奉为指导思想和理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一些人认为改革的步子太慢了、改革太不彻底了，似乎中国只有一步改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们才过瘾。进入新世纪，面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有人在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极力否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重要进展，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鼓吹只有走西方议会民主和宪政道路，才能赶上世界民主潮流。这些思潮，尽管说法不同，具体观点不一样，但实质都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和人民历经艰辛曲折、付出巨大历史代价而选择的正确道路。对此，我们要认清其实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正在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083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党的十八大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指出：“这就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①之后，他还反复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之际，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郑重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②这就将统筹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作为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更进一步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了“三个一以贯之”，其中之一就是“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页。

以贯之”^①。

风险多样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可能出现各种不同风险。当前，我国仍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出现突发性风险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并形成风险综合体。对此，习近平强调：“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②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强化风险防控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我们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客观环境的险恶，始终保有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肩负的中心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党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才能经受住新的考验，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忧患在心、准备在先”，充分估计困难风险，毫不自满、毫不松懈，做到防微杜渐、有备无患，才夺取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面对取得的成绩和良好发展态势，只有凡事从最坏处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69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19-220页。

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才能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才能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制度优势。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①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在带领人民成功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过程中积累了制度建设的丰富经验，也依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有效应对了各种风险挑战的冲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13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战略部署，这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功夫，以更好发挥制度优势，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习近平强调：“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制定改革方案的出发点，把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改革、涉及重大制度创新的改革、有利于提升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13 页。

群众获得感的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优先抓好落实。”^①新形势下，我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发展和周边环境，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只有不断增强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冲击的能力和水平，才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要加强做好预判、预警、预案和消除风险隐患能力，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降低风险造成的负面冲击，有效遏制危机的形成和演变。要提高对症下药、综合施策的能力，着眼于事前、事中、事后进行系统性谋划，加强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储备和物资保障，加大化解风险机制建设和法律完善。要提升把握和运用规律的能力，增强防范化解风险的效果。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安全底线”。习近平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②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为此，必须坚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08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084

新常态

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化。2013年，党中央作出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①这就首次明确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在2014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②这一重要论断，将新常态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的表现。2015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明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①《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11日。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33页。

态，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①当前，世界经济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孕育新的突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并集中表现为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分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与化解及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的新变化，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②。

“新常态”一词，有着丰富的内涵，“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实质上是指我国经济进入了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一是速度变化。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努力，我国经济发展逐步告别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高质量、低排放、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这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二是结构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结构层级低、产业素质低、产品档次低、产业结构不合理，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将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低端和底部逐步迈向中高端和顶部。三是动力转换。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将从要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39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45页。

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转到更多依靠科学技术、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的全方位创新和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的优化和提升上来。

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在 2015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十个更加注重”的转变，即：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十个更加注重”，就是我们在新常态下怎么干的根本遵循，是给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开出的标本兼治的对症良方。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用新常态的大逻辑观形势谋发展，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基本遵循。在认识、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并将继续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再创新的辉煌。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关键期，能不能继续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并以经济建设为牵引，带动各领域发展进步，是决定梦想能否成真的关键所在。为了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以“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为指导方针进行了一系列政策部署，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新发展理念是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由大变强之道。习近平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面对新的风险和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比较多地显现出来。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成为必须要创造性回答的时代课题。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深刻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97页。

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①。科学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③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成果，不仅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思想之魂，也是指引中国经济开创新局面的理论之魂。

新发展理念抓住发展着力点，贯穿着鲜明的问题导向，直指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国内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只有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才能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只有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才能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绿色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只有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内外联动问题，只有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

①《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9日。

②《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0日。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

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才能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深度整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新发展理念既抓住制约发展的症结，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良方。以新发展理念为先导，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发展的着力点，破解发展难题、补上发展短板、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更高境界、更深层次迈进。

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发展环境和条件都有新的变化。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必须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着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①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是要坚持从整体上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在工作中都要予以关注，使之协同发力、形成合力。二是要坚持从根本宗旨上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三是要坚持从大局上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发展观，更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四是要坚持从政治上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做好经

①《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载《人民日报》2021年3月6日。

济社会发展工作，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

习近平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①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遵循。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载《人民日报》2021年1月30日。

086

新发展阶段

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作出体现阶段性发展要求的战略部署，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中积累的宝贵经验。2020年8月24日，在我国“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之际，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①这一重大战略判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为我们在新阶段谋划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已经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也是我们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宏愿的新阶段。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

^①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①

之所以作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判断，是因为进入“十四五”时期以后，我国发展将面临新机遇、新挑战、新发展格局、新发展动力、新发展活力、新优势、新局面。从基本内涵上理解，新发展阶段的提出，表明我国正式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也进入到持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时期。同时，新阶段的提出，也意味着我们要全面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优化社会结构等方面均要作出成就，不断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

习近平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②新发展阶段首先带来的是新机遇。长期以来，我们始终牢牢把握

①《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载《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

②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各发展阶段的主要目标任务，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些积累的成就和经验，既证明我们过去走的路是对的，也为我们今后更好地开新图强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具有制度优势以及发展韧性大、经济长期向好等诸多有利条件，能够让我们以自身的稳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动荡不安，从而加快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但同时，新发展阶段也带来了新挑战。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使我国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极为复杂且充满着不稳定性。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给新发展阶段带来新的发展期待和新的发展要求。

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我们辩证看待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危与机，学会在危机中开创新局。一方面，我们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新机遇与新挑战并不是两条静止的平行线，而是运动变化的、互相紧密联系的相交线，这就要求我们也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待其中所蕴含的危机并存、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用辩证思维抓住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正确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要辩证看待国内外大势发展，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系，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带来的新特征和新要求；要有抓主要问题并予以解决的能力，在变化中增强随机应变的能力，在危机中增强转化危机的能力，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更高质量的发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新发展阶段灿烂图景徐徐



铺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有效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努力把我国发展的各种潜力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和韧性，在新发展阶段走出创新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系列以内需拉动和创新驱动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并在持续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的国内大循环，是指以国内的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为载体，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补充和支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是一种以内为主的发展模式；国际大循环，则是指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基础，以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依托，各经济体之间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循环体系，是一种外向型的发展模式。

习近平指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① 考察英

^①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在全球人口和市场规模中占比较大的现代大国，当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阶段后，都会经历由弱到强、由“以外促内”转向“以内促外”的调整，逐步从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变为以内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符合大国经济发展规律。

同时，“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是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坚实改革基础的。”^①首先，中国经济过去多年的持续稳定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供给基础。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在几代人的接续奋斗下，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建成了世界上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以及相对完整、运行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的基础。其次，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需求潜力巨大，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需求基础。再次，不断成熟完善的制度机制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赋予了制度基础。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得到更好发挥，统一公平的全国大市场逐步形成，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国民经济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基本实现畅通。相对稳定、相对独立、富有效率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①《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强调：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载《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2 日。

构建新发展格局，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魄力和定力。习近平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①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更好地统筹发展与风险、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这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合理选择。

进入“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扩大内需，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2020年5月，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②。8月，在安徽考察时，他又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努力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发挥自身优势，掌握经济发展主动权。另一方面，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国际循环重要性的下降，更不是放弃参

①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②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

③ 《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高质量发展 在加快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载《人民日报》2020年8月22日。

与国际经济循环。2020 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①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在新起点上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为“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这一战略部署，也体现了中国应对风险挑战的信心和底气，对于全党全国人民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快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促进高水平开放，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①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6 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①。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遵循。

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完整内涵，要紧扣三个关键词。其中，“供给侧”是方向，区别于“需求侧”，意指从要素供给、产品供给和制度供给三个层面入手，改变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结构性”是关键，区别于“总量性”问题，意指改革的重点是围绕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寻找解决之策；“改革”是抓手，区别于“结构调整”，意指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制度供给，为在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引擎。综合起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供给侧入手，围绕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推进改革，目标是以需求为导向提高产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24页。

品供给质量，路径是以市场为导向增加资源配置活力，动力是以改革创新为引擎增加制度有效供给，最终实现并形成供求结构高效动态对接、生产力得到解放、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新经济增长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破解我国经济发展难题的治本良方。习近平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既面临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也面临长期性、结构性问题，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供需结构严重失衡，低端供给、无效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有效供给不足，可谓是有需求的地方，缺少供给；有供给的地方，缺少需求。例如，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又严重依赖进口。大量有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上，导致大量需求外溢。事实证明，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变了，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没能跟上升级的高品质需求。解决供给与需求错配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发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使经济资源从供过于求、低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流向供不应求、高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

系统治理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要着力从三个层面下功夫：一是产品和服务供给。为市场提供有效而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是供给侧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页。

改革的最终目的，重点在于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要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这个层次要解决的问题是，根据需求结构变化，生产并提供有效、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实现供求关系的动态均衡。二是要素供给层次。集约节约的要素配置是有效、优质产品供给的前提条件。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保持相对稀缺的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量的不断增长，减少阻碍要素流动的障碍，实现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是这个层次供给侧关注的焦点。三是制度供给层次。制度是决定各种要素投入能够形成何种规模和结构的关键因素。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新的制度供给，是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没有新的制度供给做引擎，产品供给和要素供给将无从谈起。要通过多个领域的制度改革，引导要素向需求层次更高的领域配置，推动供求平衡向高水平跃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用差别化的产业、区域政策甚至用行政办法来调整经济结构，本质是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必须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上做文章，强化制度供给，破除制约要素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的羁绊，构建起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新体制新机制。要加快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企业家、创新人才改革创新的内生动力。要加快国资国企监管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打破市场垄断，放宽民营企业准入门槛，增强微观主体的核心竞争力。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改革，划清政府和市场行为、中央和地方事权的边界，给各级干部以正确激励，消除发展方式粗放的体制根源。要推进金融、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体系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弹性、流动性。总之，要通过深化这

些基础性改革，构建有助于形成高质量供给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为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实现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提供基础性制度支撑。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是治理我国经济各种病症的根本性举措。实践证明，没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没有中国经济今天稳中向好的局面，也无法实现中国经济今后又好又快的发展。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已为世界和我国发展实践所证明。”^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科学分析世界发展趋势和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深刻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②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历史转变。我们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贸易到投资，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践证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的关联度空前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战略全局，确立开放发展新理念，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的水平和层次，推动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开放格局。全方位，是指我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全世界各类型国家的开放，是面向四面八方同时开放。多层次，是指我国的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江、沿边和内地这样一个全国范围的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宽领域，是指我国的对外开放不仅有商品市场的开放，还有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各个领域的开放。

习近平指出：“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开放在国家繁荣、民族复兴崛起中独特地位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对未来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扩大对外开放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行动指南。

全面开放新格局意味着开放高地的联动。在 2013 年 10 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指出：“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94 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7 页。

域发展的开放高地。”^①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新的国家战略紧密联动、积极推进，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的开放高地正蓄势待发。全面开放新格局意味着开放领域的拓展。如今，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打破各种制约和壁垒，将开放拓展到生态、科技、民生、文化等诸多领域。全面开放新格局意味着对双边、三方和多边合作的捍卫和参与。2019年4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把大家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②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打造多层次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平台。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保持在30%以上。开放、合作、共享，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发展之道，也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真诚呼吁。事实和行动表明，中国的对外开放绝不仅仅是要实现自身发展，而是要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世界将分享到更多的中国发展红利，中国也将以自身发展助推全球共同发展。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47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91页。



090

大统战工作格局

统一战线与党的事业息息相关，既有深厚的历史和理论渊源，也有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丰富实践。10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革命、建设、改革目标广泛争取人心，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成为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把统一战线概括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并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稳定人心和汇聚人才最为迫切。我们党通过发展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巩固和发展团结进步、生动活泼的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彰显

^①《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57 页。

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包容性、多样性和社会性，为党和国家事业注入了强大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从理论、政策等方面对统一战线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邓小平强调：“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统一战线各阶层人士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不断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各领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呈现出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统一战线工作是全党的工作，要求建立大统战工作格局，勉励全党同志都要善于做统战工作，形成统战工作新合力。党中央先后召开民族工作会议、统战工作会议、宗教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制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一批法规文件，成立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对统战工作进行了密集谋划和部署，推动党的统战事业蓬勃发展。围绕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统战篇，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科学内涵，有力推动了统战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拓奋进。当前，统一战线已经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习近平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①大团结大联合，既是统一战线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统一战线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实现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②

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工作领域更加宽广，工作内容更加丰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在领导力量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统一战线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统一战线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工作对象上，必须着眼不断巩固和发展大陆范围内和大陆范围外两个范围联盟，扎实做好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团结引导工作；在工作主体上，必须树立“一盘棋”意识，形成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的良好局面；在工作机制上，必须进一步建立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56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1 页。

健全统一战线各领域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提升各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形势任务在不断变化，统战工作也要与时俱进。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必将更有力地把中华儿女团结起来，投身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聚合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9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族儿女谱写的热爱祖国、民族团结的佳话绵延不绝、世代相传，汇为照亮历史、泽被后人的宝贵传统。习近平鲜明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① 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必须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一部中华文明史，也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并交融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在和统一的整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大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在历史波澜的沉浮跌宕中，中华民族之所以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就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2 页。

在于各民族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依归，凝结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①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②这就深刻指出了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方向和路径，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注入了思想能量。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民族领域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我们同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民族问题上斗争的前哨战，这场斗争依然尖锐复杂。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就是要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大势，始终做到“三个牢记”和“三个坚持”，即牢记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牢记中华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牢记我国的历史、疆域、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坚持把热爱本民族同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热爱其他兄弟民族紧密结合起来，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的最高利益、共同利益，坚持把各民族人民的智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页。

和创造凝聚到实现各民族振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去。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做民族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因此，解决民族问题，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不仅要解决好物质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在继续用好发展这把钥匙的同时，必须把思想教育这把钥匙用得更好。归根到底，是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抓出实效。要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这是我们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牢牢把握的政治方向。要抓住文化认同这个“牛鼻子”，只有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才能巩固。要抓好青少年这个重要群体，抓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弘扬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都创造了各具特色、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提高了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要大力发展各民族文化事业，积极推进基本文化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更好地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努力营造关心民族传统文化、支持民族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大力发展各民族文化产业，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培育文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形成高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运行机制，推出一批具有战略性、引导性和带动性的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一批民族文化

产业园区和基地，在重点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①我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族人民团结互助，才能共同进步和发展。我们要牢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99页。

092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反映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及要求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哲学、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等基本形式。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都是为一定阶级、一定政治制度服务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

在世界发展史上，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就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思想体系的斗争。随着苏联的建立，“一球两制”成为事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变得愈加激烈。冷战结束意味着两极争霸局面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对此，习近平非常清醒地指出，我们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同西方国家的斗争和较量是不可调和的，因而必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西方国家不论从国际战略格局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都决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和平发展，我们越是发展壮大，他们就会越焦虑，就越要加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力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我们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不会终结，我们必须始终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是命脉和灵魂，必须捍卫。虽然在社会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根本任务没有变。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①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概括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明确指出了做好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努力方向，那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③，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根本制度确定下来。在思想文化多元多样的当今中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33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页。



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地位，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经验、新思想，不断向前发展。同时，要加强理论武装，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意识形态的多种存在形式中，哲学社会科学无疑居于基础地位，它不仅影响国家的政策主张，也可以影响社会大众的情绪情感。正因如此，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碰撞与纷争才会被人们看作是“灵魂的交流与交锋”，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才会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思潮“交流与交锋”最为深刻、影响最为持久的场所。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占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制高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获得了巨大发展，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习近平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

人类已经进入网络时代，这是一个世界潮流。网络对人类生产生活具有很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互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页。

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最大变量”，在这个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习近平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①对各种网络违法违纪言行，“要坚决管控，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这样的行为泛滥开来。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②。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全党动手、“一把手”带头、部门负责，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共同努力，构建“大宣传”的大格局。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7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337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3页。

093

红色基因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最鲜亮的底色。在带领中国人民长期浴血奋斗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孕育并铸就了赓续不绝的红色基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地方考察调研时多次到访革命纪念地，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世世代代传下去。习近平强调：“我每次到革命老区考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就是要宣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①“我们要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努力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业绩。”^②

伟大革命实践产生伟大革命精神；伟大革命精神凝成红色基因。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精神品质、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①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6 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刘华清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 年 9 月 29 日。

风的结晶，是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生命密码，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推进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之源。在红色基因当中，蕴含着党的初心使命、铭刻着党的光辉历史、凝结着党的奋斗经验。正是因为有了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人才有了改天换地的志气和决胜未来的底气，才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新问题、新机遇和新挑战，仍然需要我们持之以恒传承红色基因，让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要加强科学理论武装。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理论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党员干部政治水平的高低。只有自觉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才能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深学透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在关键时刻不迷失方向。

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要坚定理想信念。在红色基因中，理想信念犹如一道耀眼金线贯穿其中。我们党能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靠的就是坚守理想信念和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忠诚。习近平指出：“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①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6页。

指导地位不动摇，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对党绝对忠诚，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要深入发掘红色资源、红色传统的时代价值。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习近平指出：“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①要加强对红色资源的综合保护、开发和利用，使红色资源发挥出最大效能，使红色基因真正活起来。

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特殊的利益。红色基因根植于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之中，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必须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循以民为本的实践要求，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增进群众感情，践行群众路线，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帮群众之所需，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①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11 页。

红色江山，热血铸就；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习近平反复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①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在新长征路上书写新的壮美华章。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页。

094

革命精神

在党和国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问题，这是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宝贵经验。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①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又告诫全党，“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②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说过，要大力发扬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崇高精神，“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高度重视发扬革命精神。2016年10月，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①2021年2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②“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③

伟大革命精神是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最深层的内核。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④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中国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7-48页。

②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9页。

③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0-21页。

④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页。

共产党在长期的奋斗中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党长盛不衰的根基，也是党的精神力量所在。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伟大革命精神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100 多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这 100 多年间，党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所不能比拟的，但我们党总是以伟大革命精神攻坚克难、力挽狂澜。正是靠着伟大革命精神，我们党才书写了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篇章。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习近平强调：“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①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革命是一个永不褪色的主题。只有永葆革命精神，并不断赋予革命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特征，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更好完成历史赋予党的责任和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赢得荣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弘扬革命精神，坚持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迎接新挑战、开启新征程，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70 页。

国际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提出、表达、传播本国文化话语，维护本国文化安全、文化权益和根本利益的权利与权力。作为一种国家力量，国际话语权是国家实力与国家形象的表达，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长期不懈的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国外很多人对中国道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然而，在一些西方舆论的歪曲引导下，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也不少，“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霸权论”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①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的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强大的传播能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必须“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②。2021年5月31日，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再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③

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讲好中国故事。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感情、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④今天的中国不缺好故事，“我们国家发展成就那么大、发展势

①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

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

头那么好，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做了那么多好事，这是做好国际舆论工作的最大本钱。”^①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也要有信心讲好中国的故事。讲中国的故事，就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②。当我们把这些都讲清楚的时候，一个历史悠久、快速发展、和平友善的大国形象也将展现在世界面前。讲中国的故事，还要讲清楚中国的未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解疑释惑，使国际社会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认识中国，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预期，减少疑虑和误判。

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③。一是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使中国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用好新闻发布机制，用好高端智库交流渠道，用好重大活动和重要节展赛事平台，用好中华传统节日载体，用好海外文化阵地，用好多种文化形式，让中国故事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让中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二是要完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



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①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三是要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载体平台。在继续支持中央媒体走出去、参与国际传媒竞争的基础上，“优化战略布局，集中优势资源，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中央主要媒体要强化驻外机构对外传播职能，加快实施本土化战略，成为国际传播生力军”^②。充分利用我国不断增强的对外投资能力、不断壮大的文化产业，不断增加对外文化产业投资，推动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为提高对外传播能力建设提供新的平台、开拓新的渠道。

21 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也是中国话语崛起的世纪。我们必须尽快抛弃“敏于行而讷于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经验，积极塑造以“主动进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观念，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的声音。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3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4 页。

096

中国方案

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为解决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在这关键时刻，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没有缺席。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优化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中国主张，采取一系列中国行动，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方案、新的选择。这些关于“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也就是中国方案。

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总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方案的理念形态、哲学基础、轴心原则。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表主旨演讲，主张各国应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他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和途径。这个有着强大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的重大倡议一经提出，就成为中国外交引领时代的鲜明旗帜，并多次被联合国文件引用，体现了广大会员国对这一理念的普遍认同。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还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为全球应对“四大赤字”提供了中国答案。2017年5月，习近平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②2019年3月，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中，习近平又将“信任赤字”纳入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中，并将“治理赤字”摆在“四大赤字”的首位。2020年11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愈演愈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③

“治理赤字”，是指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破解治理赤字，中国答案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9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09页。

③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8日。

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

“信任赤字”，是指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破解信任赤字，中国答案是：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

“和平赤字”，是指人类今天所处的安全环境仍然堪忧，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仍然猖獗，不少国家民众特别是儿童饱受战火摧残。破解和平赤字，中国答案是：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世界长久和平。

“发展赤字”，是指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破解发展赤字，中国答案是：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



球化发展成果；更好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更加健康发展。

中国方案是一套建设性的方案，体现出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在治理理念方面，主张共商共建共享；在治理主体方面，倡导平等参与；在治理规则方面，主张全球正义。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中国方案呼吁各国发扬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097

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6月，习近平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与奥巴马会晤时，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指明了方向。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十四字原则开创了大国间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之道，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我们坚持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鲜明旗帜。

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基础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强调，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始终抓住共同利益这一主线，不要让这样那样的矛盾、分歧左右中美关系大局，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在2016年6月举行的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两国各具特色，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民众诉求等不尽相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难以避免的。……有些分歧可能一时解决不了，双方应该多从对方的具体处境着想，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加以管控。只要双方遵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就没



有过不去的坎，中美两国关系就能避免受到大的干扰。”^①2017年7月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又在与特朗普会面时提出：“双方要共同努力，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相互尊重、互利互惠，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②

新型大国关系明确了大国交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不冲突、不对抗”，就是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把不冲突不对抗作为前提，把相互尊重作为关键，把合作共赢作为核心。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中方倡导，也得到美方有识之士的认同和支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评价：“习近平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一种富有智慧的政治远见。”近年来，虽然美国国内保守势力抬头，试图建立和维持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从中长期看，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还会有新的表现且呈上扬态势，但是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不会逆转，合作

① 习近平：《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6月7日。

② 《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载《人民日报》2017年7月9日。

仍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要把握好中美关系发展大方向，积极拓展务实合作，坚持建设性管控敏感问题，中美关系一定会重回正轨。

当前，中俄正迎来两国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走出了一条结伴不结盟、共同繁荣的新路。近年来，中俄建立了高水平的政治和战略互信；双方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4300 多千米共同边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双方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世代友好的理念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双方达成“四个相互坚定支持”共识，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努力，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振兴，坚定支持对方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俄互为最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全球性、战略性、示范性，对推动国际力量平衡、促进世界和平意义重大。中欧正在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伙伴关系，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 年访问欧盟期间，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指出：要建设和平稳定之桥，把中欧两大力量连接起来；要建设增长繁荣之桥，把中欧两大市场连接起来；要建设改革进步之桥，把中欧两大改革进程连接起来；要建设文明共荣之桥，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①当前，尽管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但中欧合作发展、相向共赢而非对抗拆台、零和博弈已成为中欧关系的主流，中欧关系整体可持续推进。

^① 参见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 年 4 月 2 日。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总揽世界大势提出的重要外交理念，是对国际政治格局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反复考量和决断，体现了一代政治家的勇气、担当与创新。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大棋局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战略正推动中美、中俄、中欧关系取得新进展，为国际关系体系增加了迫切需要的稳定性。

在国际关系里，“伙伴关系”是指国家间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建立的一种友好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国与国之间互相不以对方为敌、平等而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寻求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保持并推进双方关系良性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际交往中，我国始终坚持真诚相对、平等相待，在国际社会树立了不同国家间友好合作的典范。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兴民族国家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在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坚持同兄弟国家团结一致，努力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亲疏，不依附和屈从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也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通过卓有成效的全方位外交，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深化了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逐渐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第一个“战略伙伴关系”，自那时起，构建伙伴关系就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特色



传统。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的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流，中国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倡导坚持共同发展，丰富多层次合作架构，积极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不断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不断提升伙伴关系的含金量，实现共同发展繁荣。面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中国秉承相互尊重和信任是国与国应有的相处之道，大力完善伙伴关系布局，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①大国是影响世界和平稳定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同美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构建总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47页。

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周边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我们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我们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努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习近平指出：“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前方是坦途还是荆棘，我们都要弘扬伙伴精神，不忘合作初心，坚定不移前进。”^①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同 180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 112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越织越密，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中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伙伴关系网络突破了非友即敌、或结盟或对抗的冷战思维，表明不同社会制度可以相互包容，不同发展模式可以相互合作，不同价值文化可以相互交流，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关系提供了新模式，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① 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载《人民日报》2019年4月27日。



099

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治理体系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通过平等协商、合作对话、确立共识等方式，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以解决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与挑战，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和互动的体系框架。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日益突出，世界和地区局部的混乱与动荡难以避免，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但总体来看，时代进步的主基调没有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而且，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更加不可逆转。

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来自中国的智慧是重要推动力量。1971 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中国开始全方位参与多边国际规则制定。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更是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我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参与治理规则制定、采取相应治理行动的步伐也在加快。20 世纪 80 年代，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繁荣，是我国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观念。20 世纪 90 年代后，我国更加强调自身与

世界的共命运关系，开始更多地关注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在，并提出愿意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① 这是我国这一阶段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思想贡献。其后，我国又鲜明地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文化多样和包容。

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国际秩序进入深刻调整变化之中，全球治理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需要各国共同应对的议题，有效的全球治理变得更加迫切。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日益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前沿和关键问题。习近平指出：“随着中国实力上升，我们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② 中国现在是全球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决策者、支持者、实施者，并且作用日益提升。中国有责任、有义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② 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着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①。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一方面，中国支持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发挥积极作用。长期以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做了大量工作，为维护世界总体和平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给予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更多的支持。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已经正式投入运营，中国将把资金优先用于联合国及日内瓦相关国际机构提出的和平与发展项目。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持续发展，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力度也将越来越大。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中国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发展不会牺牲别国利益，只会增进共同利益。中国将同各国一道，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世界上的路，只有走的人多了，才会越来越宽广。”^②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产生和传播，不仅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充分认可，更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和作用过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页。

② 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程中展现出良好引领效果。中国坚持多边主义，走团结合作之路，在应对经济衰退、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中，作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充分展现了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构筑全球共同发展平台的大国担当。

100

新型政党制度

政局稳定是现代化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而政党制度往往对政局稳定产生决定性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安居乐业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植根于我国土壤，适合我国国情，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2021年6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创造性、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治理需要，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基本政

治制度。”^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特征包括：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其执政的实质是代表广大人民掌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第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一方针是多党合作的思想基础。第四，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第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政治协商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这一政党制度，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格局，洋溢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大力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早在2012年12月，习近平在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就强调指出：“中共中央将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6日。



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①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党的基本方略，强调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②。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战略部署，要求“健全相互监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监督、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等机制，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完善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方法，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③。这就进一步为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的密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①《习近平在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为实现中共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2年12月26日。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

101

党的全面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2月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发表讲话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①

实行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内在要求。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列宁也强调，“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②。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对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工作都要进行领导。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工作、军队工作等方面，由于事关国家政权的稳定，如果共产党放弃了领导权，就可能失去政权。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624页。



重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也是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得出的必然结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是由于在三湾改编中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逐步形成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才有力地提高了军队的组织性和战斗力。抗日战争时期，为加强党的领导，解决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的不协调现象，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并要求各级党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有力地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才取得重大成就，迅速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了党的领导的正确性。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坚持党的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

全面领导，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不言而喻。只有在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和各方面都全面贯彻党的领导，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风雨无阻、高歌行进。

历史照亮未来，奋斗未有穷期。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放在第一位，凸显了党的领导在新时代的重要作用。要充分认识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整体的，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人民事业。要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体现到对所有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中。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开创新时代奋斗新境界，谱写新征程事业新篇章。

102

政治意识

有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能不能自觉从政治上看问题，这是衡量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否成熟的标志。正如列宁所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①因此，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强不强，对党的事业具有极端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和积累了宝贵的治党管党经验。201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公开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其后，习近平反复强调，只有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就为各级党组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方向，为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四个意识”中，政治意识是总揽，保证目标和方向，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都是政治意识在特定意义上的表达，都是讲政治的具体体现。政治意识，就是要求每个党员都要有从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的

^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页。

角度看问题，时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的意识。

增强政治意识，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历史中确立起来的政治箴言。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流砥柱，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可见坚定的政治方向始终发挥着先导与引领作用。关于政治方向，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这表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政治方向。党员干部政治上的明白，对党的绝对忠诚，最根本的就是坚持这一方向，自觉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任务结合起来，与岗位工作结合起来，忠贞不渝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增强政治意识，必须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信念是成功的基石。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共产主义是最高理想，虽然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切不可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对待这一问题含糊其词、语焉不详，恰恰反映了他们理想信念模糊甚至动摇，反映了他们理论上的缺乏和不足。因此，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必须要强化理论教育和学习，紧紧抓住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党性教育这个核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心、道德建设这个基础，不断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基，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政治敏感程度、思维视野广度以及思想境界高度，从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

增强政治意识，必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纪律要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最关键的就是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最本质的就是要维护党的权威和党的形象。习近平在谈到苏联解体时曾说过：“这样一个有着九十多年历史、连续执政七十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①党的政治纪律方面，核心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员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都要恪守党的政治纪律，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需要党员干部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保持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鉴别力，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增强政治意识，始终做到政治方向不偏、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

习近平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①古往今来，以严著称的政治组织并不鲜见，但真正做到以自我革命精神初始即严、步步从严、一严到底的政治组织却世所罕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诞生于革命年代，引领了革命浪潮，成就了革命伟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自我革命精神就融入其血脉中，成为其鲜明的政治基因；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从严管党治党观念就深入全党内心，成为其一贯的品质习惯。

建党之初，党就在党章制定修改中对入党条件进行了严格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中确立了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制度。其后，通过颁布《巡视条例》正式建立了党内巡视制度，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通过黄克功事件向全党表达了从严治党的决心意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郑重提出了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通过延安整风提升了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通过解放战争时期土改整党纠正了党内错误思想倾向和不良作风，用“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为党迎接全国革命胜利做了思想准备。回望奋斗历史，党经历过严重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

曲折、遭受过重大损失，但我们始终不气馁、不停滞、不动摇，以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的鲜明品格，牢牢扭住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这个关键不松懈，锻造了一个坚如磐石、朝气蓬勃的革命中流砥柱。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满目疮痍、一穷二白，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党秉持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的鲜明品格，持续推动从严治党。1949年11月，党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1950年5月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51年下半年开展了整党活动，1952年在党政军机关开展了“三反”运动，1956年党的八大又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等等。虽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党在自身建设和实践探索中也经历了严重挫折，但党始终没有放弃修正错误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管党治党的尝试，这一时期出现的挫折和问题，终究是党在前进过程中艰难探索的产物，它从教训角度折射出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百折不挠的内在禀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困局险境，中国共产党用全面拨乱反正向全世界传达了党敢于承认错误、敢于修正错误的决心勇气，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护。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部署，决定健全党规党法，整顿党的作风；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分期分批整党的决定；1989年秋冬和1990年春，全党进行了做合格党员的专题教育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1994年9月，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明确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2000年12月，十五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的反腐倡廉方针从标本兼治、注重治标开始向标本兼治、注重治本转变；党的十六大以后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进行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得益于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的鲜明品格，党才能以巨大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不断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锲而不舍地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以“永远在路上”的毅力韧劲，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高度自觉，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严”字当头，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靠“自身硬”凝聚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特别是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确保了党以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团结带领人民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2021年11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①这一鲜明态度，既展现出党对新时代历史方位

①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载《求是》2022年第1期。



和自身肩负使命的准确把握，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的高度自信自觉。

目标越接近，责任越重大。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只有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和锤炼自己，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坚决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正确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才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政党是运用政治规律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组织，这就决定了政治属性是政党的第一属性。因而，任何政党都必须讲政治，一个政党如果不重视政治和研究政治，不按政治规律进行政治活动，就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如果不讲政治，后果将更加严重，革命时期会被敌人消灭，执政时期会丧失执政地位。对此，习近平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①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多年来，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为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和治理政绩，这与党始终注重提升自身的政治能力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律，创造性地培育党的优秀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创造了独特的活动方式和领导方式。特别是坚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为政治建设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支撑，使党获得了强身健体、始终保持战斗力的重要法宝。

1929 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要使“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8 页。

化”，延安时期通过整风运动建立起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础，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颁布《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党内政治生活的大熔炉中讲政治、炼党性、砺品格，使我们党形成了强大的政治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分析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持之以恒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定力，在党的建设上取得显著的成效，“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实践证明，抓住了党的政治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就必须首先抓住党的政治建设这个统领和核心。

针对近年来管党治党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②的总体布局，把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建设历史，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的建设思路和布局的一个重大创新。政治建设抓好了，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大局把握住了，就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8页。

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引领开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局面。

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严格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落实民主集中制各项制度，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要加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始终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105

党内政治生态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党内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源头，决定着干部的努力方向和成长轨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一点杂质，它的健康肌体也决不允许被“病菌”“毒瘤”沾染寄生，一切思想和行为上的不洁净现象都将被其坚决清除。

当前党的建设形势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党依靠自我净化能力坚决扫除、正本清源。对此，习近平强调：“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使党内政治生活展现出新气象，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为进一步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①

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严格落实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方面要注重解决那些量大面广、表现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着力解决政治性强、破坏力大的问题。特别是要发挥好“一把手”在贯彻落实准则、条例上的示范表率作用，加强对“一把手”的教育、管理、监督，促使“一把手”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和宪法法律，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客观分析，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政治生态出现各种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没有用好。习近平指出：“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防身治病的有力武器，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不断洗涤每个党员、干部思想和灵魂。”^②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多从主观上深挖根源，切实触及思想和灵魂。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打得开情面，敢于坚持原则。对同志的提醒批评，要虚心接受，反省自我。

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每名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9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部都要增强自律意识、标杆意识、表率意识，凡是要求其他党员、干部做到的，自己首先必须做到，凡是要求其他党员、干部不做的，自己首先坚决不做。同时，要认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在党内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党内监督的各个环节敢抓敢管，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职责范围内的问题。

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我们党从百年奋斗历程中科学总结出来的，是每一名共产党员接续传承的血脉和基因。只要我们坚持以这些价值观来武装全党，坚持不懈、久久为功，锲而不舍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党内政治生态的土壤就会得到持续改良，我们就能永葆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让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06

关键少数

党的十八大以来，抓治吏从严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突出领导干部带头，由上而下，以上率下，带动形成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在此过程中，习近平就如何抓好“关键少数”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党中央也出台了许多重大政策，作出了许多重大部署，以此作为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抓手。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是身处关键岗位、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关键少数”，是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的关键群体。因此，习近平强调指出：“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①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深刻论述了抓好“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这一重大问题，指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②因此，“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

①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②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0页。



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①。“重点”“关键”“特别”三层递进的关系，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应从高级干部抓起，这就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时，习近平特别强调：“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是对全党提出的要求，也是全党的共同任务。同时，准则稿、条例稿都强调以高级干部为重点，主要考虑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而抓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关键。把这部分人抓好了，能够在全党作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因此，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必须首先从这部分人抓起。”^②

作为地方或单位的“领头羊”，领导干部的言行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因此，习近平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特别强调：“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干部不做的自己必须首先不做。”^③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2013年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郑重表态：“各级领导干

① 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

② 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

③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载《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

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①在2014年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他再次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怎么抓？就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上面没有先做到，要求下边就没有说服力和号召力。”^②“全党看着中央政治局，要求全党做到的，中央政治局首先要做到。”^③习近平还把这些要求落实在具体的规章制度中，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了高级干部以身作则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

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危害更大、影响更坏。2013年在河北调研时，习近平就指出：“在党内，谁有资格犯大错误？我看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一旦犯错误，造成的危害大，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大。”^④随后，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高级干部中存在问题的数量之多、层级之高、危害之严重、教训之深刻，是前所未有的。习近平强调：“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

①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

②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③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④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①对于领导干部出现的违纪违法行为，习近平指出：“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②他还特别强调：“法治之下，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③

紧盯“关键少数”，党中央逐步加大了对领导干部群体的治理力度，以猛药去疴的决心重拳“打老虎”“拍苍蝇”“整党风”“肃吏纪”，一大批领导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因贪污腐败和违法乱纪纷纷落马，政风吏风得到进一步净化。同时，党中央还进一步加大了建章立制力度，出台了涉及领导干部用权治政、工作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制度法规，使得对领导干部群体的管理日趋科学化、规范化。当前，对领导干部的严格监督和严格约束、对问题干部的严厉查处和严厉惩戒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① 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88页。

③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努力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习近平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党的建设必须全面从严，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①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新要求。

落实主体责任既是对各级党组织的政治要求，也是各级党组织的法定职责。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②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而要建设伟大工程，就必须夯实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这是基本的政治立场、政治态

①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②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度。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对党组织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主体责任不力的，作出了明确处分规定。这就需要各级党组织牢固树立抓全面从严治党是本职、不抓全面从严治党是失职、抓不好全面从严治党是渎职的观念，自觉把落实主体责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层层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建立了党建工作责任制，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使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但实事求是分析，一些地方和部门还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对此，习近平严肃指出，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并强调“落实主体责任，关键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①。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首先要明确党委主体责任是什么。习近平指出：“党委的主体责任是什么？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②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把党风廉政

①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1-222 页。

建设当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真正扛起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对重要工作要亲自部署，对重大问题要亲自过问，对重要环节要亲自协调，对重要案件要亲自督办。

落实主体责任要强化责任追究。习近平指出：“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①针对有些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习近平强调，要建立健全落实责任的制度，完善和规范责任追究工作，抓住典型严肃追究，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上查一级追究领导责任、党组织责任，以问责常态化促进履职到位。

全面从严治党能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关键就在于党委主体责任能不能履行好。各级党委要站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深刻认识落实主体责任的极端重要性，高度重视，勇于担当，切实履好职、尽好责。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页。



108

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总体形势稳定向好、有序可控。但同时也要看到，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国家安全内涵外延、时空领域、内外因素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战略方面，突出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国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有效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保持了我国国家安全大局稳定。2014年4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①。

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强调国家安全系统性、整体性特征的同时，明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页。

确了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重点领域。其中，政治安全是立国之本，必须将其放在首位，有效防范“颜色革命”，确保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国土安全是立国之基，必须坚决捍卫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坚决打击境内外分裂势力，确保领土不被分裂、不受蚕食。社会安全关乎百姓安危，必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基层治理体系，铲除暴恐活动滋生的土壤，有效保障人民安全。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必须充分发挥军事力量在营造态势、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等方面的战略保障作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必须深化改革、夯实基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防范系统性经济风险。信息网络安全最迫切，必须积极防御、综合应对，技术与管理并重，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信息技术领域的安全风险。科技安全具有全局性作用，必须着眼未来、超前部署、抓住机遇，重点突破关乎国家安全和产业命脉的关键技术。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关系到我国生存和发展环境，同样应当引起重视。随着走出去步伐加大，还必须高度关注并切实维护海外利益安全。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能力。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

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①着眼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②。从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出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作出战略部署。

2020年12月11日，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举行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要“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促进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③，并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点要求：一是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三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四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五是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六是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七是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八是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九是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十是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这是对新时代国家安全总体方向、根本宗旨、基础动力、战略方略、体制机制和方针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0页。

③《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载《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3日。

政策的深刻阐释，也是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集中阐发。

国家安全，重于泰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当前，党和国家事业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各项工作，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

109 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广大党员干部能够正确理解和贯彻中央精神，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挑战，领导干部具备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中央精神的能力显得越发重要。习近平反复强调，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不仅为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提供了重要遵循。

2020年4月，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①。此后，习近平

^①《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载《人民日报》2020年4月24日。

多次提及“国之大者”这个重要概念。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①

心怀“国之大者”，必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判断力是政治实践的前提，就是要求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党员干部都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政治方向、站稳党的政治立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始终绷紧国家政治安全这根弦，强化政治意识和政权意识；就要以人民为重，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就要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战略定力，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心怀“国之大者”，必须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政治领悟力是政治上的领会、理解和感悟能力，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善于从宏观层面、战略层面思考问题，能够深入理解把握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就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掌握贯穿

①《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载《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



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要准确把握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精髓要义、指导作用，特别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其作为指导实践和推动工作的行动指南；就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真正做到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心怀“国之大者”，必须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政治执行力是领会政治意图、落实政治要求、达成政治目标的实际能力，就是要求党员干部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就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践行“两个维护”，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就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初心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力戒执行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增强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坚决把党中央精神和上级指示落实到位。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需要党员干部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保持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鉴别力，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真正把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领会透彻，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始终高举人民当家作主的旗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不懈探索和奋斗。10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架构、经济基础、法律原则、制度框架得以确立并不断发展，民主发展的政治制度保障和社会物质基础也更加坚实。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将民主价值和理念进一步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中国的民主之路越走越宽广。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着眼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郑重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①的重大命题，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10月，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

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①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而且有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了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包括直接民主，又包括间接民主，把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全过程人民民主使人民的利益诉求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保证国家意志切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全链条，意味着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紧密结合、相互关联，人民不仅参与投票选举，还参与公共事务商议、国计民生重大决策、经济社会事务管理、公共权力运行监督等各个环节，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体现了民主的完整意义；全方位，意味着人民民主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覆盖国家治理的各环节，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享有广泛权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系统

^①《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载《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5日。

性、集成性和完整性；全覆盖，意味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充分调动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各阶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各级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的作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是指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都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都平等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享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最真实，是指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政治、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最管用，是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能够保障人民有序参加国家和社会治理，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们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内涵、理论内涵、实践内涵，为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也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将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进一步体现出显著优势、迸发出磅礴力量。



后 记

100 多年来，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重塑了中华民族、造福了中国人民，让一个外忧内患、积贫积弱的古老帝国脱胎换骨、浴火重生，以朝气蓬勃的面貌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自己选定的信仰和主张，中国共产党人笃信而不迷信、坚守而不墨守。他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创新创造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话语，在引领群众思想、发动群众力量中担当起了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想要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要清楚 10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使用过的政治话语。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党员应知应会 100 词》。本书收录了党史上出现频率较高的政治词汇 110 个，这些词汇政治意义鲜明、思想内涵丰富，但对一般党员而言却又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希望这本“微词典”，能让读者更加准确、更为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本书由西安外事学院吕红波、王庆英、辛怡萱著，吕红波负责对全书进行统稿。

在撰写过程中，笔者参考借鉴了众多国内同行权威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恕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深表谢忱。由于作者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予以指正。

作 者

2022 年 5 月

党员

应知应会100词

- 民主革命
- 民族资产阶级
- 统一战线
- 左派和右派
- “左”倾、右倾
- 教条主义
- 左翼
- 反“围剿”
- 敌后战场
- 持久战
- 顽固派
- 布尔什维克
- 新民主主义
- 政治路线
- 共同纲领
- 土地改革
- 知识分子
- 十大关系
- 双百方针
- 民主集中制
- 人民内部矛盾
- 拨乱反正
- 时代主题
- 基本路线
- 治理整顿
- 历史虚无主义
- 所有制
- 文化软实力
- 中国梦
- 伟大斗争
- 顶层设计
- 意识形态
- 红色基因
- 自我革命
- 关键少数
- 国之大者
- 全过程人民民主

ISBN 978-7-5115-7262-2



9 787511 572622 >

定价：49.00元